

# 從青年敘事論國民黨小組會議 與中共政治技術\*

汪正晟\*\*

## 摘 要

青年及其敘事產生於現代性的特殊歷史情境，究其本質，是一種預設青年具有先天真知與進步性的世界觀。1938-1939年間，蔣中正開始大力推廣小組會議，很大可能是由於認識到青年敘事與中共崛起的關係。這是因為小組會議是中共運作權力領導社會的核心機制，它的主要受眾正是青年，而以編組與談話為手段。本文藉由考察小組會議在國民黨內的發想、實施與結果，指出國民黨未能實現中共運用小組會議經驗的一個重要因素，即在其對青年敘事的認識不夠全面深刻，導致對於自由思辨形塑共識過於樂觀，又無法接受超越道德的青年進步性，終究不能克制青年的反權威傾向。

關鍵詞：青年敘事、小組會議、黨的建設、幹部教育、政治技術

---

\* 收稿日期：2021年3月12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12月10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 前 言

國大代表王公瓊（1902-1983）曾在江蘇長期擔任地方行政工作，在回憶錄中記下了一段有趣的敘述。當時王公瓊身為縣長，正準備向江蘇省主席鈕永建（字惕生，1870-1965）匯報請示，因而在主席辦公室目睹了以下一幕：

有一位李 X 律師先邀接見。這位律師……嘵嘵不休，看樣子不達目的不止。尤其口口聲聲說是「我們青年」要革命政府這樣做的。……惕老也已微感厭惡，但卻徐徐說道：「你已當了律師，該有三十歲吧，也不算是青年了！」<sup>1</sup>

這段歷史中的小插曲之所以值得在此徵引，並不在於它涉及什麼重大政治事件或人物，而在於反映了歷史洪流中一再閃現的政治史關鍵訊息。從中可以看到，分共數年後，激進的革命政治氣氛與話語似乎在國民黨政權內仍然生機勃勃。從李律師的盛氣凌人與鈕永建的側面回擊中，不難體會當時以青年代表革命的正當性，幾乎是不證自明的。在這套強勢話語的籠罩下，鈕永建雖有更為豐富的人生與政治閱歷，也只能隱忍。即便到忍無可忍，他也不直接反駁青年的政治合法性，只是微弱地質疑青年內涵的曖昧性。

李律師的理直氣壯，除了個人因素，主要還是因為他握持著為當時所認可的青年敘事（youth narrative）。作為一種話語中的元敘事（meta narrative），青年敘事並不僅是關於個別青年的具體描述，而是藉由闡述青年的普遍屬性與作用，影響人們對自身與現實的理解。質言之，無論青年概念本身，還是由之衍生出的青年敘事，都是某種世界觀，將青年作為解釋世界最重要的因素或分析範疇，視青年為主導世界運行的終極力量，就如同上帝之於基督教，利潤之於資本主義，個人權利之於自由主義一樣。既然青年敘事是一種宏大的世界觀，它可以各種面貌出現，存在於文本中的歷史敘事，只是它最顯而易見的形

---

<sup>1</sup> 王公瓊，《畸園殘稿》（臺北：王公瓊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會籌備委員會，1984），頁 257-258。

式之一，在諸如文藝創作、制度，乃至政治實踐中，都能發現其存在。它在不知不覺間深刻影響了人們的思路與口頭表達。許多時候，青年敘事還與其他敘事相互指涉，使得一段看似全然無關青年的敘述，如環保訴求，往往也以默認或刻意忽略的方式，體現與某種青年敘事的對話。王公瓊的回憶與許多遷臺的國民黨人相似，帶有質疑青年運動的情緒。然而通讀全書，可以發現晚年的王公瓊自詡老成持重，但在他追憶昔日與土豪劣紳鬥爭的往事之際，仍不時會提到自己青年縣長的身分，隱隱然也認同青年代表進步價值。換言之，國民黨的反共敘事與左翼的進步敘事，表面上勢同水火，實則兩者內蘊的青年敘事大同小異。這種以青年為進步力量，國民黨謂之「青年創造時代」的青年敘事，以其跨越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分野，在政治史研究上具有相當重要性。

學界普遍注意到，政治文化是決定兩黨政治行為與命運的重要因素。在比較兩黨文化差異的同時，也對其中的共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青年群體的文化與政治屬性即為兩黨共用，具有跨越意識形態壁壘的影響力。<sup>2</sup>本文在既有學術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青年作為一套現代性敘事，是如何既促進卻又侷限了政黨文化的轉型，故特別選擇國民黨小組會議為具體考察對象。本文將表明：同屬列寧式政黨，國共皆以小組會議為最基層的組織與政治運作機制，而小組會議也正好是最能體現青年敘事理路的現代政治實踐。蔣中正等國民黨人對青年敘事的體悟，促使該黨在 1938 年開始力行小組會議，同時註定了它實施成效不彰的結果。此一案例可以鑒察宏大敘事與微觀政治技術之間的深層

<sup>2</sup> 王奇生很早即注意到，「有些智識又沒有充分智識」的青年學生是決定早期國共基層組織形態的重要因素，參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第二章。唐小兵從文化資源、社會空間、人際網路等層面入手，闡明中小知識青年由地方走向上海，並逐漸在共同的左翼文化觀中，發展出廣泛的左傾文化政治。這種文化政治更接近一套基於特定人性論的「非政治的政治」的生活方式，具有凌駕國民黨權威的文化霸權聲勢。唐小兵，〈民國時期中小知識青年的聚集與左翼化——以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為中心〉，《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11期，頁64-80。李志毓則指出：即使分共以後，國民黨左派與中共黨員大體上仍屬一個全國性的左傾青年群體，彼此雖在階級問題上有一定分歧，但在理念、情感等主體狀態的相同之處更多。參見李志毓，〈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左派青年的困頓與探求（1927-1932）〉，《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頁60-69。

關係，對於把握國民黨，乃至中共在整個現代性政治中的作為與意義，或有一定的助益。

下文分為五節：第一節概述青年及其敘事的現代性淵源與政治特點，第二節說明蔣中正如何由青年問題開始推動小組會議，第三節略述中共小組會議的運作機制與原理，第四節說明國民黨小組會議的實況，最後分析國民黨理解青年敘事的侷限，及其如何影響小組會議的實施結果。

## 一、青年敘事的起源與特性

「青年」是現代文明的產物。青年的出現，一方面與一系列外在社會經濟變遷有關，工業化與都市化為年輕人帶來大量管理與勞動崗位，使他們獲得了脫離社區習俗與家庭長輩權威的經濟能力與環境支援。由於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普及延長，較之父祖輩，年輕人更有機會掌握以科學為本質的現代智識，從而取得挑戰傳統的文化資本。另一方面，青年還是現代性文化內在邏輯發展的體現。伴隨科學革命與哲學上的認識論轉向，立基於神聖經典智慧的傳統權威受到科學方法的挑戰，出於對自身「理性」的自信，人們開始大膽追求知識與相應而生的權力。隨之為了確證科學的可信度，鞏固自我掌控知識權力的能力，人們對主體性的關注與日俱增。在得到運用自然力量的同時，以德國青年為主的一群知識分子，試圖在科學與啓蒙揭櫫的機械論宇宙中保存自我，不受普遍客觀規律約束，因而也不受開明專制的支配。於是頗為弔詭地訴諸上帝，即自外於客觀經驗世界與歷史進程的基督教論述，將自我意識作為上帝賦予的超驗精神主體，導致了自我理解上的主體主義（subjectivism）傾向，也就是強調自我是遺世獨立、與客體分離的理性思辨主體，在不受外在干擾的內心深處，確保個人對自身的絕對主權。<sup>3</sup>如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所表述：

<sup>3</sup> 汪堂家，《現象學的展開：《自我的覺悟》及其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頁 157-158。  
沃倫·布雷克曼（Warren Breckman）著，李佃來譯，《廢黜自我：馬克思、青年黑格爾派及激進社會理論的起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 35-37。

只有在思維中我才在我自己那裡，我只有理解對象才能洞察對象；對象不再與我對立，而我已把對象本身所特有而與我對立的東西奪取過來了……當我知道這個世界的時候，我便在這個世界中得其所哉，當我理解到它的時候，那就更是如此了。<sup>4</sup>

在這種本質上仍是主客觀判然兩分的唯心主義框架中，對世界的認識，主要取決於個人對先天覺知能力的開發。社會化帶來的人生閱歷，反而成了干擾先驗真知的後天蔽障。由此，青年很容易對理想主義，或者應該說唯心主義的抽象思維方式與主張產生共鳴，並且將接受外在規訓與維持自我對立起來，進一步加深了反權威的傾向。自中世紀以來，社會對於學生（student 是一種頭銜，原本是底層貴族教士）的放浪形骸，一直優禮有加。連帶地，年輕人反抗權威的過激言行總能得到相當的包容。<sup>5</sup>結合上述內外因素，年輕人，這個在歷史上幾乎總是被視為需要教導的青澀群體，卻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逐漸在現代文化中佔據若干智識、話語，乃至道義上的制高點，最後在相當一部分現代主流文化論述中，變身為以其純潔與洞見引領全人類進步的青年。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在其 1890 年出版的小說《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藉由富於邪魅的年輕貴族亨利勳爵之口，對著如同完美青年化身的小說主角格雷，說出了現代性對青年的讚頌：

活起來！

要活出你內在的精采！

別留下遺憾。

始終追求著聲色之娛。

要無所顧忌。

這時代想要新的享樂觀。

它的化身也許就是你。

<sup>4</sup> 引文為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導論，第 4 節的補充部分；譯文來自沃倫·布雷克曼著，李佃來譯，《廢黜自我：馬克思、青年黑格爾派及激進社會理論的起源》，頁 37。

<sup>5</sup> Joseph S. Roucek, "The Role of Youth in Modern Politics," *Il Politico*, 32:1 (Marzo 1967), p. 102.

憑著你的魅力，沒有做不到的事。

青春苦短啊！<sup>6</sup>

這番極具煽動性的言辭，如同青年歷史登場的序曲，它反映的不僅是去道德的唯美主義，實際上是對道德的重新詮釋。人的欲望被視為自然的，因此也是正當的人性，於是追求與滿足欲望取得尊重人性的道德意義。體驗淋漓盡致的感官之樂，也就成了對人性的真誠探索與解放。這一套觀念所以成立，不單憑靠貴族圈內玩世不恭的風習，還有賴科學論述將倫理規範客觀化（實際上即物化）為一時的人造物，從而奪去其號稱源於永恆真理的神聖性。小說人物亨利勛爵對科學就很感興趣，但他無意追求科學的規律，只想以科學消解一切所謂道德成見。亨利勛爵真正關注的是自身對他人的影響力，也就是其控制外界的權力。可以說，亨利勛爵體現了現代性重權力輕價值的品質，他對青年的歌頌也是出於同樣理由，即青年是最有能（權）力打破一切成規，將「客觀」的疆界擴張到所有仍受古老傳統非客觀權威「壓迫」的領域。

「青年」產生於晚近特定的時空與思想條件，從來不是一個自古已然、普遍存在的自然生理階段，而主要是一個同成年與童年等社會範疇聯動的建構。學者指出，主流論述中的青年形象，主要反映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貴族與中產階級成年白人男性的人生理想與利益，往往是其他性別、階級與種族難以企及，甚或不以為然的。<sup>7</sup>出於同樣的時空限制，隨著世界總體政經格局的變遷，不同世代間的現代化程度差距不再明顯，甚至如許多先進國家的情形，因為已完成現代化與長期經濟停滯，無論在論述或實際資源上，青年不再擁有對上一代人的優勢，也就導致青年代表的進步性減弱甚至消失。如日本青年出現了群體萎縮的現象，或者走向兒童化，或者加速成年化。<sup>8</sup>今日西方在審美與時尚

---

<sup>6</sup> Oscar Wilde,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London; New York: Penguin, 2000), p. 25. 本段譯文為筆者自譯。

<sup>7</sup> Johanna Wyn and Rob White, *Rethinking You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Chapter 1.

<sup>8</sup> 吳端，〈對日本青年研究之理論的探討與借鑒——一個歷史與思想文化的視角〉，《當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4期，頁9-11。

品味上普遍趨向青春化（juvenilization），<sup>9</sup>但許多歐美青年已然淪落為無力進入成年期的邊緣人。這個青年由盛而衰的轉折大約發生於 1960 年代。中產階級霸權最終成功從貴族與左派手中奪得現代文化領導權，青年的理想主義與資本主義邏輯在自由民主體制下完美整合，進步也就成為單純文化象徵領域中的姿態，不再具有真正顛覆現存體制的力量。<sup>10</sup>因此，今日西方的語境中，特別在對外輸出普世價值等意識形態時，青年的進步性尚未完全消失，在西方傳媒的話語中，輸入地區的青年依然擔任發揚啓蒙進步思想的正面角色。但在對內傳播時，進步青年論述已不再具有顯著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以發展心理學、犯罪學為代表的研究視角，重新定位青年為一個身心理的（欠）發展階段。如此一來，青年遂淪為一種分析貧困、犯罪等社會問題根源的解釋框架，在相當程度上，產生了以認同危機、次文化現象等視角消解階級政治的作用。

總之，青年敘事的核心與正當性，是建立在某種先天真知能力上的進步性。反映在政治上，青年具有以下特點：自認代表未來的進步力量，因而傾向於認定現有政治秩序，包括其價值倫理與權力安排，本質上是落後反動的。由於缺乏經驗，傾向以抽象思考理解政治，其政治實踐也往往以精微的思辨推論為基礎，各類口頭論理即為青年政治活動的主要形式。因此，凡是具有宏大理論體系與理想主義的政治論述，即使脫離實際，也很容易得到青年的青睞，成為該論述的基本教義派。<sup>11</sup>如列寧所言，伴隨青年敘事產生的，是那些「上帝本來就讓青年在一定的時間內說這類蠢話的」各種左傾右傾的「學理主義」、「抽象共產主義」，以及「還沒有領導過群眾的小組的宣傳員實際上所做的那樣」的「小組習氣」等政治幼稚病的徵候。<sup>12</sup>

<sup>9</sup> François Dubet, "Youth," in Sarvepalli Gopal and Sergei L. Tikhvinsky, eds., *History of Humanity Vol. V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98-101.

<sup>10</sup> 程巍，《中產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 20-21、46。

<sup>11</sup> Johanna Wyn and Rob White, *Rethinking Youth*, Chapter 1.

<sup>12</sup> 列寧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頁 50、69-82。

具有上述自我與政治想像的現代青年，連同其背後的敘事，隨著現代性的全球擴張出現在中國，與傳統認知的年輕人樣態，在實質上已然大不相同。雖因內憂外患之故，工業化、都市化的進程步履蹣跚，但新式教育，尤其是遍布全國的中等與師範學校，仍然使大批年輕人離開家族與農村，在集體生活中習染共同的現代知識與世界觀，並且在畢業後，因為社會無力提供充分的升學就業機會，又不願回歸傳統的鄉村生活，於是大量滯留於少數大城市中，在夢想與幻滅的循環往復中，漸漸在思想與政治態度上趨於激進。可以說，新式中等教育是中國青年的主要搖籃。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新青年為代表的青年敘事，主要也是反映這一廣義中學學生群體的特質與訴求。1939年，也就是五四運動二十週年，西北青年救國會等青年團體對全國發表的聯合宣言，鮮明體現這套青年敘事的主要論點與邏輯：

五四運動對於我們青年尤其有極重大的意義。它是現代中國一切運動的開端。從五四起，青年才有獨立的群眾性的運動；從五四起，青年在愛國救國工作中的先鋒地位才被全社會所公認。<sup>13</sup>

此一宣言雖出自中共的籌畫，但作為其論述核心的五四進步青年敘事，在當時卻不是中共所獨有，而為包括國民黨在內各主要政治勢力所共同承認。也正是因為如此，當中共倡議以5月4日為青年節時，國民黨並沒有抵制，反而透過迅速接受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提出的同樣提案，以爭奪青年敘事的主導權。再從同時期國統區內的言論來看，進步青年敘事也早已流行，甚至具有真理一般不證自明的地位，正如浙江各縣政工隊員的言論所顯示的：

青年的理智，雖稍覺幼稚，而其對於社會的觀察，頗多饒有真理之處。<sup>14</sup>

從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思想以及社會運動上看來，幾乎全是青年人所推動的，當然，我們這裡所說的並不是青年是治人階級的官僚，

<sup>13</sup> 中華青年救國團體聯合辦事處、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為紀念中國青年節聯合宣言〉，《中國青年》，卷1期2（1939年4月），收入《紅色檔案》編委會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冊58，《中國青年》，卷1，頁42。

<sup>14</sup> 高宗龍，〈如何改進縣政工隊？〉，《勝利》，號29（1939年5月），頁10。

很明顯的所謂「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主義的實踐，在這一時代，是被人認為是封建時代「向上爬」的掩護的哲學口號，雖然社會上有很多的「個人主義者」在大喊其「犧牲小我」的人！我們承認青年是純潔的向上的是大公的不是自私的。<sup>15</sup>

按學術的標準，上引文字的論證恐怕經不起推敲。例如，青年的理智既然幼稚，為何對社會的觀察卻頗多真理？誰說在任何國家的歷史都由青年推動？我們為何要承認青年是純潔向上大公無私的？然而，這些缺乏學理與實證支持的言論，之所以能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地流通，正足以反映其作者與讀者共用某些如同太陽從東邊出來一般的關於青年的常識，這即是青年敘事。結合這些言論與前述宣言，以及青年的現代性起源，我們不難發現，青年敘事的核心是青年的進步性或先鋒地位，而進步性的根源則來自青年「與生俱來」的覺知能力。有了這種不仰賴社會文化經驗的先知先覺，青年才能既幼稚又窺知真理，也才能有不受社會特定既得利益「汙染」的純潔與大公無私。這種超越一切階級黨派卻又代表全體的進步性，雖然以今日歷史學者的眼光看來，顯得頗為虛妄，但在當時，甚至現在，確實有不少人願意相信，或不公開反對青年超越特定立場的先鋒地位。

青年敘事的主體主義品質，又導致政治思維方式的哲學化。人們透過將紛雜現實概念化抽象化，從而得到看來「異常清晰的科學」真相，<sup>16</sup>這無疑給予分析者智識上極大的滿足以及權力感。特別對涉世未深的青年而言，這樣的智識權力更是自身進步性的重要基石。也因為如此，如日後積極投入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清華學生武衡所回憶：

<sup>15</sup> 陳秋濤，〈內心的話〉，《越王魂》，期5（1939年2月），頁16。

<sup>16</sup> 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著，尹垠、蔣開君譯，《實踐現象學：現象學研究與寫作中意義給予的方法》（北京：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8），頁98。

總覺得我學文科不行，我搞不了政治、經濟、法律，這類工作可變因素太多。搞政治、經濟、法律要與人打交道，人實在是太複雜了，要對付各類人，我確實沒有那個本領。<sup>17</sup>

他因此選擇了理科。青年們情願主動放棄對人文、社會科學複雜性的探索，選擇理工科，以換取相對簡單抽象但清晰的分析能力。但問題是，一旦現實的複雜性被高度簡化，不用再糾結於各種矛盾兩難的困境，理想化的解決方案就顯得非常可行，也越發值得以激進的行動加以貫徹。青年牟宗三也體驗到這種抽象帶來激進的吸引力：

平常沒有人拿著一個非人的經濟觀念在這裡平白地起風波，妄生分別。平常在這裡是生活，不是觀念。既是生活，這裡當然也有人情世故、世情冷暖，但沒有一個客觀的政治鬥爭上的非人的經濟觀念光顧到這裡，現在我覺得他們有了一個非人的觀念。他們會生活在非人的觀念中了，而且很新奇，這使我有點贊嘆。<sup>18</sup>

非人的抽象觀念之所以新奇，是因為脫離了平常生活，自然沒有了人情世故等紛爭，看來就「客觀」了，這如何不讓追求單純客觀「事實」的青年贊嘆？

就如青年敘事是人們理解事實的世界觀或框架，所以不容易為事實修正，青年敘事內蘊的此一抽象思考激進化機制，也不因接觸更為複雜的哲學思維，如辯證法，而隨之改變。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就是青年敘事抽象思維與辯證法並存的代表性作品。為了說明辯證法，駁斥古典邏輯的同一律、排中律與矛盾律，艾思奇以「青年就是青年」為例，指出古典邏輯不容許青年具有多重身分。<sup>19</sup>這種比喻方式雖有助說明單純依靠抽象符號推演的問題，但仍然訴諸青年讀者的簡單推理，以二分法，也就是排中律，生硬地把古典邏輯與辯證法對立起來。或者說，艾思奇等青年所理解的辯證法，始終是一個抽象但有明確規

<sup>17</sup> 武衡，《無悔——武衡回憶錄》（北京：專利文獻出版社，1997），頁 15。

<sup>18</sup> 牟宗三，《五十自述》，收入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冊 32，頁 24。

<sup>19</sup> 艾思奇，《大眾哲學》，收入艾思奇，《艾思奇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卷 1，頁 230-238。

則的思辨方法，而不是對現實複雜性只能意會不能機械套用的深微判斷。結果就是，青年只是以更精緻的理論術語來包裝簡單抽象思維，並用以為激進的政治議程辯護。由是，不少青年敘事，儘管在話語上十分「全面」、「透澈」，但未必是對現實可靠的描述，甚至可以完全脫離現實。例如，左傾青年吳雲在得知蘇聯內部發生大清洗時，其第一反應不是從政治權力的角度探究史達林清算黨內要員的原因，而是回頭反覆閱讀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等辯證法哲學經典，以釐清辯證法與唯心論之間的界線。<sup>20</sup>顯然在其想像中，政治鬥爭只能出於理論上的分歧，那些被清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必然是犯了哲學上的錯誤。

與之相伴，受青年敘事影響的政治活動也傾向以抽象論理的方式進行。但因為書面論理不易隨時隨地舉行，遂使討論、辯論、報告、會議等口頭表達在政治中大行其道。雖然言辯往往引發眾說紛紜，增加了達成共識的成本與難度，卻也催生了更貼近民主形式的說服與決策方法。在上述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種新型態的政治實踐——小組會議，於焉出現在中國。

## 二、青年問題與小組會議

青年及其敘事雖然確實流行於中國，但在抗戰以前，不同於中共的全心擁抱，包括國民黨及其同情者在內，社會上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此現象持保留、甚至批判的態度。在國外留學的朱光潛，在給國內青年讀者的公開信寫著：

現在一般青年的心理大半都還沒根本改變。學生自成一種特殊階級，把社會看成待我改造的階級。這種學者的架子早已禦人於千里之外，還談什麼社會運動？你儘管說運動，社會卻不敢高攀，受你的運動。這不是近幾年的情形麼？老實說，社會已經把你我看成眼中釘了。這並非完全是社會的過處。現在一般學生，有幾個人配談革命？吞剝捐

<sup>20</sup> 吳雲，《無悔的奮鬥——吳雲回憶錄》（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頁194。

款聚賭宿娼的是否沒曾充過代表，赴國大會？勾結紳士政客以搗亂學校是否沒曾談過教育尊嚴？向日本政府立誓感恩以分潤庚子賠款的，是否沒曾喊過打倒帝國主義？其實，社會還算是客氣，他們如要是提筆寫學生罪狀，怕沒有材料嗎？你也許說，任何團體都有少數敗類，不能讓全體替少數人負過。但是青年人都有過於自覺的幻覺，在你談愛國談革命以前，你總應該默誦幾聲「君子求諸己！」<sup>21</sup>

朱光潛所言，絕非只是一個守舊派的謾罵。其實他對青年的處境有相當的同情，所以才會苦口婆心地勸導。從他所揭示社會對青年普遍的負面觀感來看，我們確實有必要跳出青年敘事的框架，重新檢視歷史現場中其他群體的反應。在某些情形下，透過青年的視角與敘述，呈現所謂非官方的多元觀點，或許有其價值。但我們也要認識到，青年敘述較之官方說法或民族國家大敘事，很可能也是一種看似多元，其實更為專斷的霸權論述。

如果說朱光潛對青年的同情的理解不夠，那麼後來加入中共的文藝青年柔石對自身及其同類的反省，則很難說是誤解或詆毀，而應視為青年的心聲。但就是這樣貼近青年處境的感觸，也往往充滿對自我的根本懷疑：

我觀察我們朋友，我得到教訓了。他們知道新時代要來，所以拼命去迎新時代。他們也並不怎樣深信新時代，不過因新時代終究要到的，我們去罷；似說革命一定勝利的，我們革命去罷一樣！於文學，只說賣錢。一邊他們信他們自己是天才，一邊又不肯去堅毅地做……可詛咒的青年現象！亡國的現象！飯是要吃的，人不能餓死，我知道；但他們卻說「有跳舞熱」，「打小麻將」，聽來真不舒服！唉，為什麼到如此地步！<sup>22</sup>

柔石描寫的雖是他所屬的上海左翼文藝青年圈的狀況，但又何嘗不能說是中國青年群體的寫照。他們模模糊糊意識到新時代的氣息，但對於新時代到底意味

<sup>21</sup> 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收入朱光潛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朱光潛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卷1，頁21。原書寫作於1926-1928年間。

<sup>22</sup> 趙帝江、姚錫佩編，《柔石日記》（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928年12月23日，頁107。

什麼，是否應該追求，其實沒有太深刻的思考。他們只是本能地服膺現代文化加諸於自己所謂的梦想（更確切地說是欲望），以大義凜然但內容空洞的激進政治詞藻，掩蓋心中的徬徨虛無與難平欲壑。將自己的問題外在化、客觀化為國家民族的危機，也就解脫或至少緩解了擔負自身責任的壓力，能夠繼續在青年敘事建構的話語小樓中，暫時不管春夏秋冬，沉溺在現代資產階級的生活情調中。

在這一時代氣氛中，國民黨規訓青年的政策有相當的社會基礎，未可以「反動」概括，其思路大致如陳布雷日記中所表現：

傍晚何北衡君來訪，談青年訓練問題甚久，彼主張各校應不僅授軍事訓練，直須整個使受軍事管理；並主張延長暑假，令學生作調查工作及宣傳（如公共衛生、公民常識等），以增加青年接觸社會實際生活之機會，而消除其空虛驕矜之習氣；且謂集中力量之前提，在各部分相諒解，而諒解必基予〔於〕了解；苟不了解，則諒解即難言矣。清辯滔滔，傾聽之殊有興趣！<sup>23</sup>

又如：

柏青來談歐游考察所得，示余圖片多件，皆自意、德、法、俄、奧、匈、日諸國所搜集者，訓練青年不遺餘力，真是驚心動魄。<sup>24</sup>

這些記載表明，陳布雷等人非但不認為青年有所謂先天的進步性，還視之為年少無知有待國家加強規訓的群體。與陳布雷的態度類似，抗戰前的蔣中正對青年也主要採取嚴加訓導的立場。從其日記可見，即使在一二·九與一二·一六這樣朝野震動的學潮期間，蔣中正也沒有流露出對青年學生的妥協退讓，遑論深切理解。

然而，1938年11月8日的日記中，蔣中正寫道：

<sup>23</sup> 陳布雷，《陳布雷從政日記（1935）》（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3月27日，頁33-34。

<sup>24</sup> 陳布雷，《陳布雷從政日記（1936）》（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1月22日，頁17。

雪恥：人在幼年時代受家庭壓力，到其年長乃發生反動，就要脫離家庭權威而謀獨立自由。這個心理過渡是充滿了痛苦，正如鷹隼在脫換羽毛時病弱無力，他要得到他新的利喙，須將他舊有的在石上猛擊，使其脫落。「加賴爾」之經驗，正與吾之經驗相同。父兄對子弟幼年之教育切勿過用壓力，但亦勿可姑息，終期諄諄善誘而已。<sup>25</sup>

「人在幼年時代……使其脫落」等語，是蔣中正從《信仰的意義》上摘錄下來。當時武漢陷落（10月27日）不久，抗戰前途未卜，正值民族命運風雨飄搖之際，何以蔣中正卻致力反思青少年時期的心路歷程？他將加賴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的經驗與自身互相印證，從而能共情年輕人的逆反心理與激進行為，理解為成長必經之過程。在他看來，不應就此放棄對幼子弱弟的教育，但是必須更溫和且更講究引導的方法。然而，蔣中正此刻所思考的，難道只是一般性的家庭教育問題嗎？他對青年人反權威求自由心理之注意，說明蔣或者明確地意識到：單純的說教規訓很難使青年心服口服，有必要另尋說服青年的方法。一個不容忽略的線索是，就在數日之前，亦即10月30日，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輝（1893-1974）當面向蔣力陳：黨的建設應採用第三國際授予共黨之方法，並呈上中共小冊《黨的建設》請蔣披閱。<sup>26</sup>《黨的建設》是中共為「黨的建設」課程編寫的幹部基本教材，其中有不少談組織與政治工作的內容。<sup>27</sup>當時蔣中正雖不置可否，但一直放在心上。11月8日對青年心理

<sup>25</sup> 〈蔣中正日記〉，1938年11月8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原件（以下略藏地）。另參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撰，胡貽穀譯，《信仰的意義》（*Meaning of Faith*）（上海：青年協會書報部，1929），頁42-43。

<sup>26</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234。此項線索承蒙王奇生教授主持的「蔣介石日記研讀群」（2020年7月27日）中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盛差偲提供。筆者於研讀群師友討論中受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

<sup>27</sup> 本文參考與引用的《黨的建設》，為筆者目前見到的四個版本：1. 編者不詳，萬大鈺（即萬亞剛）校訂，《黨的建設》（1938），收入《調查專報》第4號（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38），下簡稱「調查專報本」。該版為中統湖南調查統計室繳獲，加以校訂後抄送上呈並翻印。陳布雷閱讀之（手抄？）本與熊式輝上呈蔣之《黨的建設》內容應與該版相同。2. 編者不詳，《黨的建設》（臺北：陽明山莊，1951），列入「敵情研究參考資料」系列，以下簡稱「陽明山莊本」。兩版均為排印，差別主要有二，「調查專報本」保留中共版原序，即「引言 共產黨的發生與發展」，並加邊點。兩版各自有序。「陽明山莊本」無邊點、無頂批，保留1938年7月

的新體認，應該就是連日思索的一個心得。因而在熊式輝於 11 月 10 日二度陳詞後，蔣中正立即允可，<sup>28</sup>並且劍及履及，從而開啓了蔣中正對於青年、中共與幹部訓練等一連串新的思考與改革行動。10 日當晚蔣中正即提示自己：

注意：一、黨務與黨史。二、辯證法之研究。

並從 11 月 12 日開始悉心研讀《黨的建設》：

看共產黨密件《黨的建設》小冊，殊覺有益於我也。

11 月 13 日，蔣中正決意實踐書中提示的重點——幹部訓練：

注意：……四、培養與考察、儲備幹部人才之重要。五、實行幹部決定一切之幹部會議。

11 月 15 日的日記中，蔣加強了實行的決心。他在「雪恥」一項下摘錄了《黨的建設》第六章「幹部政策」的首段：<sup>29</sup>

雪恥：幹部決定一切。黨的政治路線、戰略與策略之實際應用，在於黨有堅強的幹部。黨的力量如何區分，幹部如何同群眾發生聯繫，幹部所有的實際經驗，與理論準備的程度等問題，應密切的聯繫。

11 月 19 日的日記顯示，蔣再度閱讀《黨的建設》，並將幹部訓練的重要性提到了最高的地位：

雪恥：此後惟一工作為培植與考查黨政軍各種幹部，此為救國無上之要道。……複看共黨之《黨的建設》。

---

之「序言」與 12 月「重印時附記」，其餘基本相同，內容均為 10 章。3.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第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政治部編，《黨的建設》（出版地不詳：出版者同編者，1939），以下簡稱「山東縱隊本」。該版為手抄，內容與《調查專報》版基本相同，有「引言」，亦為 10 章。4. 編者不詳（晉西黨？），《黨的建設》（1941），收入重慶圖書館編（下略），《重慶圖書館藏民國時期未刊書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16），冊 6，頁 3-234，以下簡稱「晉西黨本」。「晉西黨本」亦為手抄，內容為 13 章，每章後附參攷書目與討論題。不僅將原「引言」內容擴充，改入正文為第一章「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簡史」外，其餘內容與 10 章本詳略不同，出入較大，茲不贅。另參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統內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頁 75-76、122；陳布雷，《陳布雷從政日記（1938）》（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8 月 9 日，頁 116。

<sup>28</sup> 〈熊式輝日記〉，1938 年 11 月 10 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Butler Library）藏，記載：「繼陳改造黨意見，頗承嘉納。」

<sup>29</sup> 參見《黨的建設》（陽明山莊本），頁 87。

蔣中正不僅同意採用共黨方法，且同意將中共密件《黨的建設》公開印發，<sup>30</sup>更將《黨的建設》列入幹部必讀：

幹部應看書籍〔籍〕之指定：《管子》、《王安石》、《張居正》、《黑格爾辯證法》、《黨的建設》、《三民主義》、《民權初步》、《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峨嵋訓練集》。<sup>31</sup>

11月18日，蔣中正記下了《黨的建設》的讀後感：

注意：一、共黨教育與經驗，是由其國際百年來祕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訓而成。故其紀律最嚴，方法最精，組織最密，任何黨派所不及，因之其手段亦最毒，情義與道德掃地無餘。讀完共黨之《黨的建設》一書，深有感也。能使其人趨向於民族國家之路線則幾矣。

可以看出，蔣中正雖然對中共「手段亦最毒，情義與道德掃地無餘」不以爲然，但他確實對《黨的建設》中「紀律最嚴，方法最精，組織最密」的幹部教育經驗衷心佩服，不由得興起愛才之心，而有了「使其人趨向於民族國家之路線」的想法。然而，對於馬列思想、中共的鬥爭精神，以及《黨的建設》中使人嘆爲觀止的政治實踐，蔣中正的體認越是深刻，越是不能不意識到現實之嚴峻：除了當前日軍的大規模攻勢，另一場憑藉尖端政治技術的無硝煙戰爭，在無數青年國民心中隱然有燎原之勢。國民黨在這方面的落後，較諸對日作戰的劣勢或許更甚。蔣中正逐漸明白，中共政治攻勢如此凌厲，在於其佔領了某種戰略制高點。此一戰略優勢雖牢籠一世，涵攝方方面面，卻遠非直觀。當時人固然

<sup>30</sup> 「調查專號本」於1938年12月重印，並加上蔣中正的頂批。〈序言〉中指出公開印行的目的，主要是認識中共的真相，針對其策略方式以求應付。之後小心翼翼地建議：「我們還以爲書中所述關於什麼制度問題，組織問題，領導問題，工作方式問題，黨員修養問題等等，也不無可供參考之處。」在〈重印時附記〉中則語氣堅定地強調：「我們覺得有許多缺點和毛病是本黨（中國國民黨）黨員所應該同樣警惕的，有許多的辦法是可以供給我們重要的參考的」；「給我們同志參閱」；「至少可以作我們一個重要的借鑑」，應是反映了蔣中正此時的態度。參見《黨的建設》（調查專報本），〈序言〉，頁2；〈重印時附記〉，頁3。另見〈蔣中正日記〉，1939年1月3日：「分發《黨的建設》一書。」

<sup>31</sup> 〈蔣中正日記〉，1939年1月7日。

不易領會，更難一語道破。蔣中正察覺的那種形勢，本文則將之放置在世界史的脈絡來理解，稱之為「青年敘事」。

早已風靡於青年之間，並貫串於《黨的建設》一書中的辯證法，同時也受到蔣中正的密切注意。<sup>32</sup>12月6日「看《黑格爾辯證法》始」，深受觸動，第二天記下：「雪恥：革命鬥爭，而不知辯證法方法論，如何能不失敗呢？」12月14日的日記又寫了：

雪恥：昨晚起感冒甚激，故今日終日臥床休養，惟看《辯證法》如常。在外患方殷、身體違和之時，仍堅持研究黑格爾辯證法，可見蔣中正學習此種思維方法之急切。直到12月19日，「下午看《黑格爾與辯證法》一書完，對於我思唯〔維〕當有補益也。」在一個月的時間中，蔣中正對辯證法下了一番苦功，自覺頗有收穫，也將《黑格爾辯證法》納入幹部的必讀書目中。

在蔣中正思考青年、中共黨建與辯證法時，另一個頻繁出現的詞彙則是「小組會議」。「小組」一詞來自俄文 *кружок* (*kruzhok*)，英譯為 *circle*，即小圈子之意。在成為列寧主義政黨專有的政治術語之前，小組可能是流行於十九世紀中後期歐洲與俄國有教養階層中的社交小圈子，與沙龍有些類似，是由若干名流與有心躋身上流的年輕貴族或文人，圍繞有權勢的主人形成的恩庇網絡。因為沙皇高壓統治與貴族反商文化等俄國特殊因素，小組帶有比較強的反抗當道的菁英氣質，也傾向以隱密的方式進行，這種小組文化實為俄共施行小組會議之憑藉。<sup>33</sup>

在中國，小組會議是蘇聯對外輸出革命的結果。至遲於1926年，時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部長的甘乃光（1897-1956）就已提及：

為什麼現在有許多區分部不能負起這個責任呢？……是區分部沒有小組的設置。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在運用方面，區分部實在除了設置小組以外，應該規定小組的工作，小組會議中，應該最少有以下的五

<sup>32</sup> 〈蔣中正日記〉，1938年11月14日。

<sup>33</sup> Barbara Walker, "Kruzhok Culture: The Meaning of Patronage in the Early Soviet Literary World,"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1:1 (February 2002), pp. 111-112.

種工作，即是政治報告，社會報告，工作報告，工作批評，及關於黨的進行的討論與決議。這五件事，一定要完全做到，區分部才可以變成黨員工作與訓練的大本營。<sup>34</sup>

再結合甘乃光所著小冊《小組的運用》來看，甘氏對小組會議的一般型態已有相當的認識，強調了小組長觀察、領導組員的重要，也對小組會議議題的選擇與討論方法有所指導。然而，甘氏所理解的小組領導，還停留在基督徒個別傳教說服的層次，並未提出任何利用組織力量引導組員討論的辦法。證諸此後國民黨內小組會議長期得不到發展的事實，可以推斷國民黨雖有人對小組會議早有興趣，但受限於理論認識與實務經驗，未能真正進入此種新型政治技術之堂奧。<sup>35</sup>

對當時大多數國民黨人來說，小組會議可能很少有效運作。蔣中正在 1928 年 12 月 7 日的日記中提過一次小組會議。據萬亞剛（即萬大鈺）回憶，因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含 1938 年正式成立前，以下簡稱中統）內部由中共反正而來的「轉變」分子甚多。所以在抗戰前即承襲中共作法，有常態且充實的「小組生活」。<sup>36</sup>在 1938 年 1 月 24 日蔣中正的日記出現：「諭建豐令述小組會議指導要領」，顯然此處的小組會議已具有新的特定內涵。隨後蔣日記中小組會議一詞出現的次數明顯增加。蔣中正想藉小組會議訓練幹部的思路也漸趨清晰。尤其在 11 月 8 日以後，隨著蔣中正對青年與中共問題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小組會議儼然成爲他心中念茲在茲、未曾或忘的當務之急，如 12 月 18 日的預定欄位中先後提到「小組會議繼續開會」、「各機關實施小組會議之規律」。1939 年 1 月 1 日，蔣中正在日記中已經將「嚴厲執行小組

<sup>34</sup> 甘乃光，《以黨建國》（廣州：廣州國民新聞報社，1926），頁 24。

<sup>35</sup> 甘乃光，《小組的運用》（廣州：中山大學，1927），頁 6-8。

<sup>36</sup> 萬亞剛曾服務於中統本部，也是最早提醒上級重視並編校《黨的建設》的國民黨人。他一方面舉出在小組會議中讀過《聯共黨史》（《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細節，又說抗戰爆發後整個小組生活即停止。若果真如此，一則與 1938 年後普遍推行小組會議的政策不符，二則他顯然不可能在抗戰前就讀到 1938 年才出版的《聯共黨史》。再考慮萬在 1938 年後才較長待在中統局本部，因此，筆者懷疑萬亞剛所說的小組生活，可能仍是 1938 年以後的情形。見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臺北：李敖出版社，1990），頁 206-207。

會議制度」作為新一年的中心工作，且四次將小組會議與監察、檢閱、審查這樣的機制並舉，甚至預備「各級黨部專設審查小組成績部，建立監察制度，建立銓敘登記與調查失業，收羅人才方案」（民國二十八年大事表）。到此，蔣對小組會議的期望，已不僅止於訓練幹部，還擴及對黨政人員的全面考核與選拔。1月22日，在痛批國民黨務腐敗現狀的一大段文字末尾，蔣中正又提到「本黨內容：散漫零落，無紀律，無賞罰，無工作檢討，無小組會議，不看黨報，不知主義，不遵命令，有職員無黨員，有薪水無工作。」除了說明他仍將小組會議當成一種監察黨員的措施，小組會議還隱隱然承載著使國民黨振衰起敝的功能。從十天後（1月31日）日記的文字來看，說蔣中正要藉小組會議重頭做起，恐怕並不誇張：

黨員總登記後之辦法：淘汰腐化，實施小組會議。

蔣中正確實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致力於小組會議相關實施細則要領與配套制度的制定落實，如2月的「本月大事預定表」：「實施登記審查小組會議，與確立經常檢閱制」；2月7日「編製小組會議實施細則與要旨」；3月16日，「小組會議注重法令之解釋」；3月24日「黨政軍中央各機關小組會議情況與成績之檢查與報告」。其成果就是諸如〈小組訓練綱領〉在1939年3月23日第五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17次會議上通過。<sup>37</sup>到了4月2日，蔣中正提出「小組會議審查處之組織」，標誌著圍繞小組會議的制度建設已初具規模。

如果說上述對蔣中正日記的爬梳，還不足以確定青年問題、中共黨建、辯證法與小組會議之間的內在聯繫，補上《黨員須知》這一塊拼圖，當可使整個歷史景象更趨完整。在蔣中正開始讀中共《黨的建設》第三天（1938年11月14日），即在日記中考慮幹部教育教材：

五、催編黨史與革命史。六、指定各級黨員應備書籍〔籍〕（分高、中、下各級），政治、經濟、社會學各書，速審定必讀之書。七、速

<sup>37</sup> 編者不詳，《黨務活動手冊》（重慶：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1944），頁31。

編黨員須知與生活須知，各小冊生活分組織、鬥爭、集體等項。八、主持黨報之人選與整頓黨報。九、研究辯證法。<sup>38</sup>

緊隨《黨的建設》與辯證法的出現，《黨員須知》此後為蔣中正頻繁提及。如 12 月 10 日「催著黨員須知與三民主義理論」。如果說，這反映了蔣中正在理論層次的高度上規畫《黨員須知》，似乎也符合上述 1938 年 11 月以來蔣中正的思考脈絡。1939 年 3 月以後，更隨小組會議各項規章制度的推進，「審定黨員須知」一類的文句，<sup>39</sup>也持續出現在蔣中正的預定事項中。直到 1939 年 7 月 6 日，蔣中正才以確定的語氣寫道：

青年團訓練，以《黨員修則》、《黨員須知》、《新生活綱要》為基本課本。

為了將《黨員須知》納入幹部訓練的教材，蔣中正顯然花了很長時間與精力。從 1940 年出版，但可能很早即在中央訓練團課程中使用的《黨員須知草案》來看，小組會議顯然是一個核心內容：

至於集體學習的方式，就是區分部會議；或在區分部之下，組織小組，舉行小組會。區分部有五人以上就可組織，如因區分部人數過多，則可劃分小組。組織小組自三人以上，最多不能超過十人，因為再多召集就發生困難了。按學習的內容來分，區分部會議或小組會的性質，可分為政治討論會、工作檢討會、批評會、辯論會等各種。但在舉行某種會議時，並不限定一種內容，例如舉行討論會時，可以極短的時間，進行十分鐘的工作討論，或互相批評。在討論發展到最激烈的時候，也可以臨時再改為分組辯論。總之，應依據當時的情緒，與組員的需要而決定。<sup>40</sup>

<sup>38</sup> 〈蔣中正日記〉，1938 年 11 月 14 日。對比《黨的建設》第八章「宣傳教育工作」可知，上引日記內容即為蔣中正對該章重點的摘錄。

<sup>39</sup>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3 月 18 日。直到同年 7 月以後，《黨員須知》才較少出現。

<sup>40</sup> 中央執行委員會編印，福建省秘書處翻印，《黨員須知草案（再版）》（1940 年 9 月），頁 47。

事實亦是如此。作為正式版本，1941 年底下發的《中國國民黨黨員須知》，也保留了上引草案中這段文字。<sup>41</sup>顯然無論草案還是定本，都強調小組會議的編組形式不必拘執，重點在於以言談辯論為核心的集體政治學習實踐。必須指出，就中共而言，《黨的建設》主要供各級黨校受訓幹部使用。這些學員有相當工作經驗與位階，或者不太需要專門學習小組會議這樣的基層組織方法，故原先《黨的建設》只在關於黨支部功能、宣傳教育、黨團作用等處簡略地提到小組會議的運用。但證諸「調查專報本」上國民黨圈點的各段落，如「支部應當成為教育黨員，訓練黨員的最基本的學校」（頁 21）；又如「黨為統一指揮群眾組織中自己的黨員的行動，特許組織黨團，經過黨團去實現自己的領導，叫作黨團作用」（頁 120），可以推論，在借鑒《黨的建設》時，除了依樣畫瓢，國民黨還能在相當程度上融會貫通，得出富於洞見的歸納總結，從而攫取對自身需求特別重要的中共技術資源——小組會議，用於活化名存實亡的基層黨組織。<sup>42</sup>

<sup>41</sup>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校，《中國國民黨黨員須知》（重慶：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1941），頁 85。又見頁 31：「因為它〔小組〕是訓練的單位，它的任務，在乎訓練黨員的智能，啓發黨員自動的精神，提高黨員工作的興趣，所以它的會議與活動方式，不必拘守成規，而要體察環境，隨機運用。」

<sup>42</sup> 早期 10 章本的《黨的建設》（如「調查專報本」與「山東縱隊本」等），均未專章處理中共基層黨支部，也沒有使用「小組會議」來說明黨支部以下組織的活動與原理，但仍可看出其所述即為小組會議。如言：「支部組織的形式，以適合於環境與鬥爭的需要為原則，不是固定不變的」；「在祕密環境中，支部不宜太大，支部幹事會的規模也以不超過三人為最好。」又如有時將工廠、作坊中組織的黨支部稱為工廠作坊的小組，而且其中的黨員「能夠共同的學習，共同的研究，共同的進行群眾工作」，也就是小組生活。至於說「應有計劃的，在支部或小組中，討論黨的政治文件，小冊子，黨報，以及政治問題等。『發展政治討論』，應當成為支部工作的一個重要口號」，無疑就是對小組會議的描述。見《黨的建設》（陽明山莊本），頁 18、19、21、139。以上都說明《黨的建設》中所謂支部與小組之間並無必然區別。從《黨的建設》對於潛伏在非黨群眾組織中黨團的角色著墨較多，可以看出黨團與小組的功能是基本類似的。《黨的建設》作者也提醒讀者，組織形式要適應情勢變化，不可拘泥。雖然早期《黨的建設》版本中沒有「小組會議」這四個字，亦無法斷定國民黨對小組會議的重視與《黨的建設》無關。有意思的是，隨著各根據地迅猛發展，《黨的建設》為適應各地培訓大量基層新幹部的需要，在傳抄與教授過程中，較之舊版內容，增添了更多政治技術細節，其中即包括對小組會議的著重說明。例如，較晚出的「晉西黨本」《黨的建設》（1941）為了適應「新幹部新黨員佔絕大多數，而且在成分上小資產階級出來的人也佔多數。這些幹部與黨員又缺乏階級教育與鬥爭中的鍛鍊」的環境與需要，將支部獨立為專章（第 6 章），並在其中舉出了許多使用小組的辦法。如「小組開會，小組長當主席，每星期至少要開會一次，檢查各種工作，討論黨報及各種文件，

相關證據還可見〈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期課務基準表〉。此時已在黨政課程中有「黨務與團務」一類，內容即包含：

講述本黨之組織宣傳訓練指導之原則與方法（更應注意技術），檢討過去工作之經驗與教訓及今後改進之方針與方案（以黨員須知及黨的建設作參考書）。<sup>43</sup>

直到 1939 年 10 月 28 日，蔣中正仍不忘指示陳果夫：

陳主任。「黨員須知」中關於組織與組織的領導及幹部政治（應如何做幹部）此二項最為重要。「黨的建設」內之要點應可盡量採取編入在內。又關於馬克司與共產黨不能在中國實現與存在之意，亦應在三民主義章中多加注重。<sup>44</sup>

蔣中正以《黨員須知》全方位模仿，乃至超越《黨的建設》的意圖可說躍然紙上。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引文中的「幹部政治（應如何做幹部）」一句。對陳果夫等國民黨人來說，這個「幹部政治」應該是一個陌生概念，所以需要括號中的文字說明。由於說明比較簡略，以致忽略了幹部政治中「講政治」的意思。

---

布置工作。小組長在開會前要有準備，如有可能，須將討論的問題先通知本小組的黨員，使大家都充分準備，在會議時更能得到圓滿結果。」「晉西黨本」各章後還有討論題目，如「9. 支部幹事會怎樣領導小組？」又未對黨團與小組做嚴格區分，而視為類似政治技術加以運用，「黨團係為一定的政權領導機關或民意機關之黨員組織，黨團負責人由黨委指定。在民意機關中之黨員，如人數較多，除由黨委指定同志組織黨團外，其餘黨員分別組織小組，受黨團領導，但上下級黨團不得發生領導關係。」最後，關於《黨的建設》在中共小組內廣泛而靈活的使用情形，「在支部中必須經常的在小組會議上進行教育，（研究支部訓練班的教材，以及上級黨部的重要論文），區委以上需要組織幹部學習小組，由負責同志擔任領導，研究並討論上述的適合於該級幹部的教材。」上列的例子表明：從較晚出《黨的建設》中「小組會議」的內容，有助於正確認識早期版本中語焉不詳的「小組」。然而國民黨所見雖是早期版本，卻能精準掌握小組會議在中共黨建工作中的關鍵作用，可見蔣中正等人確實是讀透此書，且將之化為實踐。引文見「晉西黨本」的《黨的建設》（1941），收入《重慶圖書館藏民國時期未刊書叢編》，冊 6，頁 179、128、134、144、171。

<sup>43</sup> 〈特交檔案（黨務）—中央訓練團（第 0 三八卷）〉，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300-00044-006，「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期訓練實施計劃」。

<sup>44</sup> 〈領袖指示補編（十四）〉，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106-00014-004，「蔣中正電陳果夫對黨員應著重組織間領導與幹部政治並編入黨的建設及說明中國適合三民主義不適合馬克斯主義與共黨生存」。

但還是可以看出，受到中共啓發，蔣中正已經隱隱體會到幹部教育涉及的複雜政治素養與技術。

從上述分析可知，1938年11月以後，在蔣中正的思路中同時考慮與處理的問題，如中共、黨的建設、黨員須知、辯證法，最後是小組會議，彼此看似並無直接關聯，其實，爭取青年以及其背後的敘事，正是其中的核心因素。除了在1938年11月8日思考了青年的心理，1939年3月3日，蔣中正又對自己提出幾個大哉問：

雪恥：一、問本黨為何不能掌握青年。二、問一般大學教員為何要反本黨。三、為何黨政不能打成一片。四、如何使黨團能發生實際作用。五、人地事物四者之組織程序如何……七、辦黨之要點在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其目的則在大同之治……。

這些問題從青年開始，並不是隨機的結果，彼此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互相作用的關聯性。可以說，在蔣中正的認識中，所有問題的發生與解決都離不開「本黨為何不能掌握青年」這一最根本問題。由於「青年」是一種形塑世界觀的元敘事，青年與大學教員可想而知是青年敘事的產物與生產者，整個現代政治世界觀也同樣在青年敘事的籠罩之下。從蔣中正提問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對這個青年敘事的大格局多少已有了體察。其實，當他將青年視為一種自然「要脫離家庭權威謀獨立自由」的心理階段時，蔣中正就開始與青年敘事對話，並對青年進步性或顛覆性的根源提出了論述。這也意謂著他開始注意到青年敘事對人們政治思維與實踐的重要影響。所以要解決諸如「如何使黨團能發生實際作用」的問題（此處黨團應當是指各團體內黨的小組，而不是國民黨與青年團），就必須先研究作為青年思辨方式的辯證法，必須先徹底摸清中共小組會議何以適應並調動青年政治熱情的祕訣。

蔣中正提出上述問題之時，小組會議規章正在緊張編訂之中，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也在密集上課。蔣中正對黨政訓練班十分重視，也因此，在提出問題後的第二天（3月4日），他就在日記中提醒自己「黨團實施之實習」。從

《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三期訓練實施計畫書》的內容來看，黨團實施之演習，應該就體現在訓練課程中的調查演習，其實形式就是將學員分為若干小組，討論指定問題的處理辦法。同時，黨政訓練班第三期也有專門的小組會議科目，其中許多指定的題目，正是蔣中正 3 月 3 日的日記中所提出的。<sup>45</sup>顯然蔣中正已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中劍及履及地推行小組會議。值得一提的是，爲了在 3 月 15 日給中訓團黨政訓練班講演，蔣中正連續幾日反覆研究修訂講稿內容，直至感覺到「所講行的哲學一篇，必於將來在人生哲學上佔重要位置也」。<sup>46</sup>從他在講演中不同以往地頻繁使用哲學詞彙，以及下列引文來看，可知蔣中正頗爲得意的創獲，其實與毛澤東的〈實踐論〉類似，皆是以辯證法論證認識與實踐的關係：

通常往往將「行動」二字和「思維」相對立，或是和「言論」相對立，其實廣義的講，所謂「思維」和「言論」，只是「行」的過程，原是包括在「行」的範圍以內，而並不是列於「行」以外的。

我們所說的行的哲學，就無分於動靜。在跡象上看，雖然是有動有靜，但在整個進程中，向外表現發展的時候，固然是行，生機潛蘊成長的時候也是行。只要是合乎天理，順乎正軌，動亦是行，靜亦是行，宇宙與人生，無時而不在行進之中。<sup>47</sup>

此處也可佐證，蔣中正於中訓團推行小組會議，實與其對青年、中共與辯證法的通盤理解密不可分。

故而當黨政訓練班第三期畢業時，蔣中正寫道：「本日黨政班第三期學員畢業，此爲上半年一大收獲，訓練計畫如期完成，引爲自慰」；<sup>48</sup>「黨政班第

<sup>45</sup> 編者不詳，《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三期訓練實施計畫》（重慶：中央訓練團，1939），頁 25。

<sup>46</sup>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3 月 11 日。

<sup>47</sup> 蔣中正，〈行的道理——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講〉，《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卷 16，頁 144-145、147。

<sup>48</sup>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7 月 5 日。

三期如期畢業，實為黨政基本工作初步告成，而安定四川亦在其中矣」。<sup>49</sup>畢竟，在推動以小組會議訓練幹部、爭取青年的道路上，國民黨邁出了第一步。

至此，似乎可以合理推測，1938年武漢會戰以後，出於對青年左傾激進化的擔憂，蔣中正對青年心理與相關問題有了新的體認，這又促使他開始研究中共的幹部教育經驗與辯證法，而這一番研究的初步結論就是：唯有實施小組會議，才能整合中共的成功經驗以及青年思維習慣，最終達成爭取青年認同，革新國民黨幹部隊伍的目標。再聯繫到1938年7月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其效仿社會主義青年團以與中共爭取青年的用意昭然若揭。前文所引蔣中正日記等史料中，也可見蔣將《黨員須知》與青年團，以及中訓團內國民黨與青年團幹部的訓練一併考量。可見青年問題是導致推廣小組會議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此意義上，小組會議是青年敘事下政治思維與實踐的集中體現。國民黨於此時推動小組會議的一個關鍵原因，很可能即是源自蔣中正對「青年敘事」與其挑戰較為系統的回應。

接下來的問題是：雖然知道小組會議是中共掌握的一套適應青年敘事的政治實踐，但這一實踐在中共脈絡中原有的具體內容與機制為何？而國民黨所理解與實踐的版本又是什麼？最後還要問：國民黨為何如此運用小組會議？其原因又與青年敘事有何關係？

### 三、政治運作中的中共小組會議

1949年出版的中共幹部教材《思想教育舉例》，係根據中共政治實務經驗總結而成，較之《黨的建設》，更多地著墨於政治技術的運用細節，對我們瞭解中共脈絡中的小組會議具有很高的價值。

《思想教育舉例》的作者是夏征農（1904-2008）。他曾是1930年代上海著名的左翼文化活動家，還擔任過蘇中公學校長，是長期負責中共幹部教育工

<sup>49</sup> 〈蔣中正日記〉，1939年7月8日。

作的一線幹部。蘇中公學成立於 1944 年，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抗大）第九分校改編而來，是新四軍系統最主要的幹部教育機構。《思想教育舉例》就是夏征農總結他在蘇中公學辦學的經驗談，<sup>50</sup>無疑是瞭解中共「政治工作基本上就是教育工作」思路特點的理想材料。<sup>51</sup>此書具有很強的實用意識，雖然名為「思想教育」，整本書卻幾乎不提抽象思想或理論，而是詳細說明實施思想教育的具體步驟與技術方法。可以說，夏征農並不太強調思想的特定意識形態內容。在他看來，思想教育就是改造青年思想的策略、手段與體制，只要妥善運用，就能把青年學生的思想改造成適合共產黨組織需要的狀態。

正因為夏征農的思想，或者說政治教育，並不太強調個人對思想的單獨領悟，而主要訴諸外在條件與組織力量來改變人的思想。所以像閱讀教科書這樣傳統正規的個人學習方法，在整個幹部教育中扮演非常邊緣的角色。課堂上，乃至正規教學時間外的集體學習，才是最主要的學習途徑。這種學習方法更接近一套集體政治生活實踐，實際上也就是小組會議。通觀《思想教育舉例》可知，這一套以集體討論學習為主的教育方式，有其物質客觀條件的因素，但更多是對延安整風經驗的總結與落實，本質上就是以小組會議規訓青年。

夏征農並未直接進入教學方法的討論，卻先詳述編組學生的主要原則與方法。其精神在於確保從 2 到 3 人的互助組，到 10 人左右的學習小組，以至每個班級中，都能有一定比例在文化程度上，尤其是在政治覺悟上比較領先的學生，也就是積極分子。使得每一個編組單位中的中間與落後分子，也就是在政治、文化程度上比較平庸或可疑的多數人，都能接觸到相當數量的積極分子，以接受其幫助或刺激。夏征農特別告誡教師，編組時固然不能忽略個人意願，交情篤厚的人在一個編組內確實有利於學習，但更要注意政治能力的高低搭配，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配備力量，便於互助學習」的效果，以達成用正確

<sup>50</sup> 據書中所顯示的學生成分：「一千七百個新學生，女的佔百分之二十，小學程度佔百分之八十，中農以下成份佔百分之七十，二十歲左右年齡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純潔、熱情、學習要求較高，家鄉觀念重，怕參軍；最大多數為老解放區青年，有我黨我軍的長期影響與教育。」參見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吉林：新中國書局，1949），頁 2。

<sup>51</sup> 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領導作風》（大連：大眾書店，1947），頁 2-3。

政治立場引領教學與學習的目標。<sup>52</sup>這種運用非常細膩隱蔽的技術手段，以奠定有效的政治控制基礎，正是中共小組會議的奧義所在，亦即對每個小組成員文化政治程度的仔細甄別。在中共的理論體系中，所謂文化與政治程度有嚴格的區分。文化程度高未必代表政治覺悟高，甚至可能正好相反。因此沒有一成不變的積極分子，在挑選積極分子時不可拘泥，要考量所需影響小組中的中間與落後分子的具體情況。但在實際上，政治覺悟往往與個人文化與智識高度相關。因此強調政治，或者說價值觀的優先地位，並不是單方面不講道理的洗腦。

夏征農指出：

發揮自由思想，必須與教育相結合，自由思想的要求，即是教育的要求。比如，當進行時事教育的時候，發揮自由思想，就是要求學員盡所欲言的，提出自己對於每個時事問題的意見，以便集中起來，比較討論，以求得打破各種不正確認識，得出一個正確認識。<sup>53</sup>

文中所謂時事教育，就是以新聞時事報告與討論的方式，使學員在瞭解時局的同時，也透過報導採用的視角，接受報導者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中共非常清晰地認識到：爲了實現政治教育的功能，新聞時事報導必須顯得客觀，以提供看似無價值預設的資訊，讓受眾根據「真相」得出「自己的」結論。這種尊重受眾推理的要求，正是對青年敘事的順應，也就是「承認」青年具有獨立洞悉真理的能力。但在更深層次上，卻又是對青年此種先知先覺所需條件的破解與利用。因此，要讓學員在討論中發揮自由思想，就是討論主題也應由學員自行提出。教員，其實也就是小組的指導員，最好只起引導總結的作用。<sup>54</sup>夏征農頗有把握地指出：只要能提出諸如「誰是內戰的發動者？」這樣有隱藏問題意識的主題，則討論中縱使有辯論，其結論也不會違背中共的主張。夏征農這份自信並非一廂情願或依賴權威，而是建立在前述小組編組的有效準備上。從以下分析可以看出：

<sup>52</sup>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頁 14、37。

<sup>53</sup>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頁 36。

<sup>54</sup>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頁 32-33。

先由學生提出問題……其毛病在於漫無邊際，使一般學員易於感到茫茫大海，難以捉摸，或者海闊天空，亂說一通。最好的辦法，是把兩者〔按：指教師講授與學生自行思考〕貫通起來。這就是，就每一課提出幾個大問題，每一個大問題，即為一個教育單元，先由教員做一概要的啟發式的報告，並在俱樂部公布一定的參考材料，然後在小組內進行漫談，提出問題。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把各組所提的問題，歸納起來，組織小組討論，小組不能攪通，又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即開展大組，或全班討論，使問題一步一步深入，一步一步擴大，在討論時，開闢牆報為第二戰場，以推波助浪，造成熱潮，最後由教員做一較詳細的總結，即轉入第二個大問題。<sup>55</sup>

簡言之，教師最初只提供一個思想的框架與材料，讓學生自由思想有一個大略的邊界，然後透過小組內自由程度最高的「漫談」，展現學員思想的大致面貌。出現了共同性較強的問題，可上提為更高級別編組的討論重點。在如此層層遞進擴大討論人數的過程中，對下一級討論做出「歸納」以供後一級討論依據的那些人，也就是每次討論的主持者，無疑是真正的關鍵角色。他們大都不是教員，也沒有正式權力，既然他們是各自小組內政治覺悟、文化程度較高的積極分子，自然形成話語優勢，對每個編組的控制完全可以順勢而為，大抵用不著強制。教師無需太多干預，只要與這些數量有限的積極分子形成良好協調關係，雖然處於眾編組最頂端，也能確保討論的方向與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理想狀態下，小組成員完全可能在非常自由的討論形式與感覺中，自願接受指導員準備的思想結論。

引文之末，提到以牆報「推波助浪，造成熱潮」的作法，令人聯想起李維漢在整風初期，透過〈矢與的〉這份青年辦的牆報，營造與王實味「公平」論戰的熱烈樣態，為其後以民主動員全面批判做準備。<sup>56</sup>這也透露中共小組會議

<sup>55</sup>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頁 17-18。

<sup>56</sup> 李維漢，〈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風運動〉，收入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頁 16-29。

的「功夫」不僅在場內的討論，更在場外政治形勢的營造。中共政治工作的真正特點，其實並不是規定個人思想，而在於以激動人心的技巧引入群眾因素，從而使個人自覺地調整立場。夏征農多次描述鼓動情緒的具體步驟，<sup>57</sup>同時提醒讀者，激烈的情緒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因此思想教育也就不是只要運動起來就可成功的。掀起學習熱潮，不過是樹立鬥爭的方向，鼓勵群眾的鬥爭情緒，推動鬥爭的發展，是思想改造的準備，是教育的第一步，而不是表現成功。<sup>58</sup>

之所以要造成熱潮，是爲了引起學員之間內心的思想鬥爭。隨後，夏征農更指出，只有在鬥爭中才能有突破內心的機會。這樣說來，認爲中共一切做法都是爲了壓制自由思想，恐怕是一種誤解。對中共來說，一灘死水的和諧穩定沒有太多價值。它需要自由引起的思想碰撞，藉以摸清每個人的真實態度，從而深入內心加以改造。在此意義下，中共非常需要青年的思辨主體，以及喜好辯論的政治習氣。因爲有了思辨主體，才有可供探測與改造的內心；有了辯論，才能誘使青年主動將內心狀態組織成可以展演的論證，從而暴露在群體的影響之下。如果青年只是一群「恂恂似不能言」，沒有強烈內心活動需求的長者，那麼一切政治與幹部教育將無從開展。所以夏征農要再三申明：

發揮自由思想……整風以來，就已成爲教育上的一個重要法寶……我們有些幹部，以爲發揮自由思想，只是爲了暴露某些學員的隱私、錯誤與政治面目……使學員產生一種非常有害的感覺，以爲發揮自由思想，是學校「引魚上鉤」的一種手段……形成恐慌與不安，無異替學員建築起一道思想上的防禦……是阻礙發揮自由思想，是與教育要求完全違背的。<sup>59</sup>

引文清楚指出了整風經驗對中共幹部教育的直接啓發。其中最重要的無疑就是發揮青年的自由思想，與之相伴的則是「引魚上鉤」的問題。這說明整風、中

<sup>57</sup>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頁 23、26-32。

<sup>58</sup>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頁 24。

<sup>59</sup>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頁 33-34。

共幹部教育與青年之間，有種互相依存又互相衝突的關係。中共幹部教育想要成功，就需要青年追求自由抽象思辨的主體狀態，甚至予以鼓勵。但幹部教育越成功，也越傾向改造青年主體，青年則不免封閉內心以「防禦」黨的改造。然而若要做到徹底改造，又不得不要求青年維持相當的自由思想狀態。從邏輯上看，這是一個無解的難題。但深諳整風經驗與青年特點的夏征農，卻還是從矛盾中看到了對立統一的可能，那就是以民主整合幹部教育與青年主體的需求。他說：「開展民主討論，是一個細緻的組織工作。」<sup>60</sup>這個組織工作之所以必須細緻，則在於它要求領導者具備高超的領導藝術，其具體核心要務則是：

當討論進行時，領導上必須隨時注意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組織力量與教育骨幹。<sup>61</sup>

如前所述，整套小組會議的基礎，是確保每一個小組中都有積極分子。有了積極分子的正確引導，就能以相對少數人影響多數人，從而使民主討論 / 程序的結果符合領導意圖。但誰是積極分子，積極分子該如何行動，則必須仰賴領導者的細心觀察與親身指導。以一個 70-80 人的單位為例，分三組由 3 人領導，每個領導者需要動員兩個幫助對象，也就是願意配合領導意圖的積極分子，以成立一個核心，這種核心仍是以大致上 1 人對 10 人的經典編制，分散到每個小組，其任務是：一、自己起模範作用；二、對人起推動幫助作用；三、對政治工作起保證作用。<sup>62</sup>總之，為了確保民主的結果合乎期待，必須在正式的民主程序前，以談話為主，完成大量細緻的鋪排、說服與協調工作。其過程則往往如此：

漫談的要求，是互相啟發……準備意見。互助漫談與民主討論是互相結合，而又有所區別的……漫談重在啟發，討論重在爭論……漫談按照互助組進行，要不拘形式，不問時地，不受任何束縛，才能談得開，

<sup>60</sup>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頁 37。

<sup>61</sup>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頁 38。

<sup>62</sup> 饒漱石，〈反省階段中的工作中心及如何進行反省〉，收入：編者不詳（下略），《整風運動參考材料十集》（寶應：江潮社，1944），頁 4、7。

談得好。互助漫談，雖說是民主討論的第一步，但不是，也不應是只在討論開始前才進行，每一次討論會後，都要進行互助漫談，以準備下一次討論會的意見，這才能使討論會一次比一次充實，一次比一次深入。<sup>63</sup>

此處「漫談」為政治術語，是領導人對積極分子、積極分子對其他個別學員做工作的一種主要形式與方法。透過兩、三人之間看起來無拘無束的自由談話，具有政治、文化資本優勢的領導或積極分子，不但可以有效掌握談話對象的思想狀態，也可以不著痕跡地影響對方。做個別對象的漫談工作需要懂得察言觀色，還必須和顏悅色、善於溝通說服，才能使對方一開頭暢所欲言，最後又心悅誠服。「要好像是愛人一樣能夠做到無所不談，因此在一切漫談中不要輕作結論。只當多多交換意見，一直到對象自己完全瞭解的時候為止。」<sup>64</sup>整個過程涉及許多高級的政治技藝，需要當事人親身實踐反覆體會，這才是中共幹部教育所要培養的主要能力。中共充分依靠青年好發議論與表現思辨能力的特性，經由他們難以拒絕的友善談話，逐漸化除青年的意氣。這一套工作必須做得細緻，所以人數不能太多，有時要私下進行。這是中共所謂「黨內祕密」較為人忽略的一個意涵，蓋只有維持這種祕密情態，使群眾在個別漫談小組中孤立地形成判斷，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領導與積極分子的影響力。

當每一個漫談小組的工作都已完成，就能進入學習小組這樣的小組會議，並逐步擴大討論的規模。如夏征農所指點，在小組會議層級就要以爭辯形式的民主討論為主。由於可能持異議者多半已在漫談中被說服，所以不妨在民主討論中開放自由辯論。可以想見，這種受到引導的辯論，由於沒有真正的分歧，爭辯再激烈也不過是圍繞枝節，不會發生因為少數人牙尖嘴利而動搖基本政治價值的荒唐場面。就算仍有一、二個堅持己見者，在民主討論中也無法影響已有定見的多數。經過現場實實在在辯論產生的民主決議，不但具有正當性，更重要的是可執行性，因為它的真實基礎不是一時民主辯論的結果，而是對多數

<sup>63</sup>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頁 42。

<sup>64</sup> 饒漱石，〈反省階段中的工作中心及如何進行反省〉，收入《整風運動參考材料十集》，頁 6。

確實有效的掌握。探明了整個運作機制，就會發現以下所言絕不是空話，而是對小組會議流程的精簡概括：

不發揮自由思想，則漫談討論無從開展，是非無從辨別，真理無從發現，也就不能進步。<sup>65</sup>

當然，在漫談中以少馭多，在民主討論中以多制少的辦法未必總是奏效。整套方法畢竟不是公式，關鍵在對青年的特性瞭若指掌，才能將漫談與討論的效果發揮到淋漓盡致：

另外採用個別的談話和勸說（找小組長或相熟者）、使會議的批評與會外的活動結合起來，這對於某些虛榮心濃厚的人特別適用。<sup>66</sup>

「虛榮心」反映個人對社會期望的認知，因此也可以間接反映社會的風尚習氣。而在小組會議的語境中，能夠得到群體正向反饋的行為，則是在討論中積極自我批評與互相批評。這種社會習氣帶有濃厚的青年色彩，也是小組會議談話政治技術的基礎。

最後，即使一切手法都不能奏效，出現難以形成共識的情形，由於漫談與小組會議均可為非正式協商，大可在漫談與小組會議階段重複說服與論辯。這一套手法可以總結為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包含民主和集中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就像一個身軀的胸和背，是密切相聯、相互制約的，決不能加以分割。沒有民主，集中就失掉力量；沒有集中，民主也無從實現。黨內發揚民主，就是要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sup>67</sup>

民主與集中不是先後發生的因果關係，而是同時作用一體之兩面。無需否認，民主集中制的實施過程經常包含赤裸裸的權力運用，對個別成員的說服也未必都是「和風細雨」。但仔細分析整套機制，似乎很難說中共的民主集中制不民

<sup>65</sup>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頁 33。

<sup>66</sup> 李培南，〈分局黨校討論反省自傳的介紹〉，收入毛澤東等著，《思想指南》（出版地不詳：北方出版社，1949），頁 119。

<sup>67</sup> 溫濟澤，〈憶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收入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頁 49。

主。畢竟，縱使在自由民主體制中，正式投票以前也存在大量的遊說、廣告、政策傾斜、委員會提案、專家諮詢，乃至利益團體之間私下協商交易等行爲。這些旨在影響民主決議結果的行爲，可以說是民主的一部分。中共小組會議的特殊之處並不在其操縱民主，而恰恰是其將民主作爲不可或缺的權力運作機制。此外，很難想像若無青年敘事及其文化的支持，此一機制可以憑空運作。無論漫談還是爭論、自由思想還是民主討論，都是青年表現自我的一般方法，但對其他社會群體，如農民、士紳、機關職員，卻相當陌生乃至驚扭。<sup>68</sup>要之，透過對青年的精確掌握、克制與運用，中共得以在不直接訴諸強制灌輸的情形下，有效運行小組會議。

《思想教育舉例》一書中描述之政治技術，不僅在蘇中公學內部得到實踐，在整個蘇中地區（約當今日長江北岸之南通市、泰州市、揚州市）亦獲得廣泛應用，有相當史料足以證明這一點。以漫談爲例，蘇公教員曾介紹實際運用的狀況：

政治課不要以單純的空洞的理論爲滿足，要與同學思想實際聯繫起來，就是在政治課前，首先弄清楚了同學們思想上普遍存在的是那些問題，即以這些問題作爲上政治課的內容，針對著同學們的思想深處，才能真正做到改造思想，學用一致。我校王祖德先生替三隊上政治課就採用了這種方法，結果不但同學們在思想上有收獲，同時學習興趣也因之而提高。<sup>69</sup>

再看蘇中公學的一名政治指導員楊力航（1925-）的日記，可知整套思想教育與整風技術高度結合，而其後果也與整風相同，出現了嚴重的逼供信問題，必須加以修正：

<sup>68</sup> 關於中共如何將以自我批評爲代表的青年談話技術向非青年群體普及，以及其中涉及的微妙領導技術細節，請參考趙諾，〈中共晉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評會〉，《抗日戰爭研究》，2020年第3期，頁4-21。

<sup>69</sup> 武慶元，〈政治課與思想領導配合起來〉，《生活（蘇中）》，新期3（1946年3月8日），頁73。

在校部開會，校委會同志一再強調：整風教育要立即改變過去的做法——一切為了突破「典型」。我們的目的是思想教育，如果思想沒有得到提高，即使反省出天大的東西也是沒有用的。整風、審幹、鋤奸三者結合，但根本目的是整風；不能把整風作為手段，而把審幹、特別是鋤奸作為目的。夏主任指出：我們主要是從思想上政治上提高他們，對「典型」也要一視同仁，不要有固定的看法，不能用主觀的方法去「追」。在工作作風上，應該走群眾路線，不能偏聽學習組長的話，也要聽「典型」本人的話。在小組裡少用刺激性語言，以討論的態度弄清思想毛病。要加強個別談話，開展互助活動。要善於發揚模範，使用積極分子，創造模範班排。<sup>70</sup>

從日記最後一段來看，夏征農固然要糾正審幹過火的現象，仍然堅持繼續貫徹從漫談至小組討論至大組報告的整套作法。這套思想教育技術是否也普及到了蘇中公學之外呢？不妨看看 1945 年 7 月 10 日召開的蘇中青年代表大會展現了什麼：

大會第一階段為時事學習，要求認清形勢，確定方向。首先由管文蔚司令員作政治報告，然後小組漫談、大組討論一天半，代表們發揮自由思想，情緒活躍，搶著發言。代表中對成立聯合政府、反攻靠誰的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爭論很熱烈。

青年代表爭論的問題，也是當時蘇公學員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們依據解決學員思想認識問題的經驗加以引導，雖然爭論愈來愈烈，但真理也就愈辯愈明。<sup>71</sup>

<sup>70</sup> 楊力航、李孝賢，〈蘇公生活片斷〉，收入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蘇中公學校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頁 138。

<sup>71</sup> 余伯由，〈蘇公倡議召開的兩次蘇中青年會議〉，收入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蘇中公學校史》，頁 41。

青年代表大會也完全按照整風學習的民主教育方式，從時事教育開始，反覆運用漫談、小組、大組討論，與會議前中共在各教育機構內推展的教學型態一脈相承，學用之間毫無隔閡。

夏征農提到了大會中進行的時事教育，更進而揭出了青年大會的推廣作用：

有個別代表開始曾有這樣的感覺，天天在這裡討論蔣介石，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時局的發展對每個人都是有關係的，過去很多青年感到苦悶徬徨，不就是因為看不清時局找不到出路嗎？……展開一個打開思想運動，這就是要到會代表回去後，立即到學校，部隊，教師，自由職業的各種青年中，召集各種會議，傳達這次會議的內容，開展民主討論，務使每個青年從思想上攪通這樣兩個問題。<sup>72</sup>

綜上可知，小組會議既是黨最基層編組內的集會，但更主要是一套以民主集中制為原理，適應、利用並克制青年特性的權力運作機制。其重點並不在於按照制度規定成立小組與舉行會議，而在於以政治甄別對成員進行靈活分組，確立少數政治核心對多數人的最大影響力。小組自身可以是更大組織（無論是否隸屬於黨）中的一個類似黨團的祕密核心，透過包括小組會議、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內各種政治談話技術，控制其身處的組織。<sup>73</sup>同樣地，小組也可能為更小的政治核心所控制。因此，小組會議可以僅是小組成員商討工作、理論，甚至生活瑣事的非政治性會議。但在有政治任務時，小組會議就是執行上級命令的政治核心。其一切活動，無論是否冠以小組會議的名稱，亦無論形式上如何發揮自由思想與民主討論，最終都是透過小組成員反映黨的意志。總之，為了靈活運用政治談話，將目標人群予以有效分化、說服與掌握，必須保持相當的祕密性與臨時性，也因此不宜從字面上僵固理解小組會議的功能屬性。也只有

<sup>72</sup> 夏征農，〈蘇中青年代表座談會特輯：做好兩件事迎接蘇中青年代表大會：蘇中青年代表座談會總結〉，《生活（蘇中）》，期4（1945年6月10日），頁1-2。

<sup>73</sup> 關於中共黨團運作原理，可參考馬思宇，〈無形與有形——中共早期「黨團」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2期，頁32-47。

瞭解小組會議在權力運作過程中的政治核心本質，才能明白它真正的重要性，也才能理解蔣中正推廣小組會議的動機與最後結果。

#### 四、現實中的國民黨小組會議

小組會議推行之初旗鼓大張。國民黨刊物特別透露是總裁親批：開會頻率由原訂的兩週改爲一週，以示層峰之重視。<sup>74</sup>這番更動似乎也令許多國民黨員有耳目一新的感受，如陳誠 1939 年 3 月 3 日的日記所顯示，幾位中央訓練團學員向他反映：「於小組討論，尤感興趣」；陳誠認爲「彼等對小組會議及業務實習，發表意見甚多，足證自發教育之切合實際」。<sup>75</sup>如上文所述，學員所說之業務實習，與蔣中正同樣在 3 月 3 日提及的「如何使黨團能發生實際作用」，以及 3 月 4 日的「黨團實施之實習」等想法有密切關係，其實都是以小組會議的方式，復活久已有名無實的黨團制度，從而使國民黨能如中共一般，透過遍布各機關單位或行業團體的黨團，真正實現對國家社會的有力領導。從陳誠與蔣中正兩人的記述判斷，這樣的構想，至少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的初期實踐中有一定的效果。這或許也是蔣中正對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三期畢業感到欣慰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還可以從蔣中正的記載中發現若干小組會議成功的跡象，如到 1943 年 3 月，也就是正式推行小組會議四年以後，還能看到「自余親自參加小組會議以來，黨政業務，較有生氣矣」這樣的事例。<sup>76</sup>當然，這些高層領導人的感受，只能作爲個別小組會議成功的間接證據。更多時候，「開小組會議的時候，大家都仿佛感到無事可作，無話可說，只當作例行公事一般」。<sup>77</sup>爲解釋此種現象，我們有必要檢視更多小組會議開會的具體情形。

<sup>74</sup> 徐敬哉，〈小組會議之理論與實踐〉，《政治前線》，卷 4 期 6（1941），頁 15。

<sup>75</sup>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下略），《陳誠先生日記（一）》（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1939 年 3 月 3 日，頁 201。

<sup>76</sup>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臺北：國史館，2011），頁 889。

<sup>77</sup> 蔣中正，〈改進黨務政治之途徑與方針——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席五屆十中全會總理紀念週講〉，《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9，頁 380。

此處，王貽蓀（1918-2009）的日記保存了許多國民黨基層小組會議實況，非常有參考價值。王貽蓀是個小知識青年，抗戰後參加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簡稱戰幹一團），從此堅定地信仰國民黨與三民主義。1941年分發到第二軍政治部。從王貽蓀的日記內容來看，雖說在軍事單位工作，但長官同僚都是文員，更接近一般機關內黨部。王貽蓀隸屬於軍隊，然而軍校並不承認他在戰幹團的資歷。他是三青團團員，但在黃埔系毫無背景，與高層黨政素乏淵源，就是一名基層國民黨黨工。王貽蓀受過政工訓練，也有志從事政治工作，在第二軍政治部卻主要是整理文牘檔案，不免深感鬱悶。和那些處於複雜政治生態，或者擁有堅實政治資源的利益共同體，如地方黨部中的士紳、黨政高層的門生故舊相比，王貽蓀與他的同事主要是認同國民黨的理念。某種意義上，他們才是真正的國民黨黨員。因而，王貽蓀眼中的小組會議，無論就一般性與實際上而言，都能很好地反映小組會議在國民黨內的政治實踐。

1941年，初下部隊實習的王貽蓀參加了小組會議：

一月十七日

舉行小組討論二次，同學發言頗踴躍，余先後發言三次，申述對於軍紀與鄂省過去民眾組訓之檢討。<sup>78</sup>

顯見王貽蓀等青年實習生參加小組會議相當熱情。分發第二軍政治部後，王貽蓀還主持了小組會議，難得的是在日記保留了他為此準備的整個討論提綱。摘引如下：

六月二十八日

參加來部後的第一次小組討論會……余因不明會議情形，且對討論題亦未充分準備，欲辭之，但不得卻而慨然允之……討論題目為「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大綱列示於後：

- （一）什麼是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民生哲學
- （二）我們對於民生哲學應有的基本認識：

<sup>78</sup> 王貽蓀，《王貽蓀戰時日記（1941）》（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頁8。

1. 宇宙觀、2. 歷史觀、3. 社會觀、4. 本體論、5. 認識論、6. 方法論
- (三) 民生哲學與我國固有的政治哲學及倫理哲學的綜合考察
- (四) 「民生哲學」與「唯心論」及「唯物論」的比較研究：
  1. 類同點
  2. 不同點
- (五) 我們對於「唯心論」及「唯物論」的批判：
  1. 「唯心論」暨「唯心史觀」的缺點及謬誤
  2. 「唯物論」暨「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的缺點及謬點
- (六) 糾正對於「民生哲學」的錯覺及謬見：
  1. 「民生哲學」與「民生史觀」暨「民生主義」的界說
  2. 「民生哲學」是否「心物綜合論」或「二元論」
- (七) 「民生哲學」的真正意義：
  1. 民生哲學為天體運行的自然原理與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
  2. 「民生哲學」的時間性與空間性
- (八) 結論：……進行當屬熱烈也。<sup>79</sup>

小組會議的討論題目「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和戰幹團的政訓課程同名，<sup>80</sup>有可能直接承襲自該課程。政訓課程如此設計，可能是國民黨貼近青年抽象思辨喜好的一種嘗試。從王的反應看來，這種哲學化嘗試取得了一定效果。在日記中，王貽蓀數次提及討論哲學的熱烈興奮，如：「談話的方向是轉向國際而理論而主義的中心，『民生哲學』」；<sup>81</sup>「晚，於操場某民家吃麵，作哲學之討論，興熱烈萬分。」<sup>82</sup>

<sup>79</sup> 王貽蓀，《王貽蓀戰時日記（1941）》，頁 91-92。

<sup>80</sup> 劉東慶，〈流亡青年與軍隊政工：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的曲折歷程（1938-1941）〉，《民國檔案》，2019年第3期，頁 133。

<sup>81</sup> 王貽蓀，《王貽蓀戰時日記（1941）》，9月4日，頁 136。

<sup>82</sup> 王貽蓀，《王貽蓀戰時日記（1941）》，10月30日，頁 160。

在小組會議中納入哲學討論，正合乎青年之所好，收到了一定成效。不過一年不到，小組會議卻已開得頗為寥落：

十二月二十日

本部小組討論自再度熱烈提倡後，今已趨於降下□矣。今日，指導員皆未出席，組員參加者亦少，僅憑余之綱要，藉作報告而了事之。但余因準備小組討論故，今日已充分準備，頗有心得搜集各方面資料，繕資料參考壹份也。<sup>83</sup>

雖然部內長官一度大力提倡，王貽蓀本人也有心準備，但也如同蔣中正所見，小組會議不免成爲「無事可作，無話可說，只當作例行公事一般」。爲了與頂層的蔣中正與基層的王貽蓀的見聞做參照，再舉一個中級官員參與的小組會議爲例。

身爲一個中層幹部與公務員，陳克文（1898-1986）也在日記中留下大量中下層人員小組會議的細節與個人感想，如 1939 年 4 月 18 日的內容：

院裡今日上午舉行第一次的小組會議。根據總裁的手諭，由國防最高委員會定了一個公務員公私生活的輔導辦法，其中規定各機關的公務員每星期要舉行一次小組會議。小組的組員就各機關裡工作單位來劃分，小組會議的工作有六項，前三項是檢討批評過去一星期的工作和行爲，並討論今後的改進方法；後三項是指定應讀的書和研究的問題，讀書和研究所得，要提出會議報告。這個主意是很好的，不過事實上恐怕做不通，結果不免循行故事，敷衍塞責。政府所要求於公務員的是工作，私生活如何可以輔導得來？今日總務組全體工作人員五十多人原分兩組，合為一組開會。我做組長，把小組會議的意義和會議應做的工作加以說明之後，問大家有無意見，都沒說話，只好宣布散會。也許是第一次，大家沒準備。以情形來看，將來也不會相差太遠的。

<sup>83</sup> 王貽蓀，《王貽蓀戰時日記（1941）》，12月20日，頁183。

試想想，集上下階級不同的人員在一個會議裡，除了上級人員的訓話之外，還會有甚麼討論研究的可能呢？<sup>84</sup>

如陳克文所述，政府機關中的小組會議的重點，實際上放在督促公務員檢點生活與進修，顯然偏重小組會議處理單位內部事務的一面，而並未發揮小組會議在政治運作上的作用。由於不強調政治運作，自然也沒有必要在編組時考慮積極分子的配置問題，於是出現上下級同處一組的情形。在沒有預做政治談話工作的情形下，僅憑出席長官的當面引導，確實很難讓人甘冒得罪上司同僚的風險，發表什麼批評意見。此外也可看出，行政院的小組似乎都超過十人，本來就很難開展討論。可以說打從一開始，行政院的小組會議就不利於政治談話技術的施展，自然也不容易發揮促進政治運作的核心功能。在政府機關推行的小組會議前景不容樂觀，在黨部召開的小組會議也早已徒具形式：

下午四時參加一五二區分部成立會，被舉為執行委員之一。全數黨員二十人，到僅十二人。來參加黨活動已兩年多了，黨員不重視參加組織活動，視區分部或小組會議為無聊。此是國民黨目前一種最普遍，亦最不良的現象。<sup>85</sup>

能夠看出小組會議弊病現象的人並不少見，但多數人即使看到現象，也往往如陳克文一般，因為缺乏對中共政治實務的瞭解，找不出解決辦法，只能因襲老一套辦法：

下午參加院裡小組會議，文書、銓敘兩科的人員共三十餘人。因為許多人對小組會議抱著一種輕視的態度，敷衍的心理，所以又講了二三十分鐘的話，然後請大家自由發表意見。會場的情形還不算壞。<sup>86</sup>

<sup>84</sup>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1937-195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上冊，1939年4月18日，頁400-401。

<sup>85</sup> 陳克文，《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1939年1月25日，頁360。這應是陳克文在日記中第一次提到小組會議。但如前面引文所示，陳工作的行政院直到4月18日才舉行第一次小組會議。由此推斷，小組會議先前可能在若干單位中試行過，直到1939年4月以後才成爲一個由黨到政全面推動的正式制度。

<sup>86</sup> 陳克文，《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1939年4月24日，頁405。

陳克文身為小組指導員，本是小組會議的靈魂人物，若在中共的情境中，他應該透過私下談話，先行掌握若干小組中的積極分子，然後由他們出面引導討論。然而陳克文所採用的，正是他不久前才批評的上級訓話，竟然覺得效果還可以，說明中共的小組會議技術確實已超過大多數國民黨人的理解範圍。無計可施之下，陳克文主持的小組會很快轉型為時事與生活漫談會。<sup>87</sup>到 1939 年 7 月 9 日，行政院檢討一個多月來小組會議的成果，各組長皆表示無足可稱。陳克文根據見聞，表示其他機關也是如此，並且索性完全將小組會議理解成公務員補習教育，還要撰文研究補習教育的法規方法。<sup>88</sup>

行政機關小組會議的狀況恐怕還不是最差的，軍隊小組會議「覺得每週要舉行一次，非特形式機械呆板，也感到單調得可憐，故有意或無意的連續流會！報告表則□□或指定紀錄來向壁虛構」。<sup>89</sup>勉強開會後，則是：

「會議後三小時內，將會議經過及討論結果，造成簡明報告表，呈送上級黨部審查」，在指導員和小組長的職責第六項有這樣的規定。為著虛應故事，而報告表大都是「支離亂雜」——好像「批評事項」，係小組會議中的重要節目；檢查缺點，改正錯誤是牠〔它〕的唯一課題。蓋自我或相互批評，可以養成勇於改過和相互切磋的習性，於促進工作，輔導進修尤為有效，但各級小組未加充分發揚，又無遵照實施、自我批評，多謙虛空洞；互相批評，則流露出無為〔謂〕的誤會和摩擦。所作結論非綜合論，仍為個人意見的重述；至漏填討論題目、和摘錄發言人的意見，弄到遠離題旨。<sup>90</sup>

這種機械謄寫表格的小組會議報告，也不限於軍隊，事實上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的類似文書也是如此。其結論顯然也是為了趕時間上交，僅是列舉個人意

<sup>87</sup> 陳克文，《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1939年4月25日，頁405。

<sup>88</sup> 陳克文，《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1939年7月29日，頁458。

<sup>89</sup> 鍾武，〈推行小組會議的絆腳石〉，《黨魂月刊》，卷2期2（1940年12月），頁77。

<sup>90</sup> 鍾武，〈推行小組會議的絆腳石〉，《黨魂月刊》，卷2期2，頁77。

見，提上一些無關痛癢的「綜合」，難以達到凝聚共識，貫徹上級意圖的效果，更談不上提升成員的政治覺悟與技術。

按理說，中央訓練團團員來自各機關，經過一定篩選，又較乏機關內人事的顧忌，應該可以好好發揮小組會議的功能。然而，根據 1944 年唐秉玄（1908-1994）在中訓團臺灣幹部訓練團的觀察，情形似乎也很不理想。某次三青團的分隊小組會議，討論在臺推動團務問題，舊團員 15 人，新團員 10 人，竟只有 9 名舊團員到會。分隊是三青團最基層的組織，唐秉玄對此不免感慨，「精神如此散漫，工作安能推行，更何能負推行三民主義之責？」<sup>91</sup>

不僅如此，無論王貽蓀或陳克文，他們的日記都顯示，經常有一天舉行兩次小組會議的情況。陳克文往往主持完小組會議，緊接著又參加區黨部會議。可以想見，正因為小組沒用，各小組遂集中於一天內開完。這樣的會自然不會太長，也就討論不了什麼。陳克文 1939 年底的見聞，頗能體現國民黨小組會議困境的本質：

〔陳〕之邁從浮圖關訓練團回來，說今早訓練團舉行畢業典禮，蔣委員長訓話，提及黨政軍各機關人員小組會議及公私生活行為輔導辦法，說與會的人恐怕還有未見過的。廣西派來受訓的人說，廣西現已實行了，其他各省的也多跟著說已經實行，一時似乎空氣很僵。委員長這時候慢慢的說，很好，很好，那末這辦法的第一條是甚麼呢，廣西的人答出來！答不出？甚麼人答出來？大家都答不出。於是委員長著實教訓了一頓，說這可見大家做事敷衍不切實。這不說委員長平日的做事精神如何如何，至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極機警，富有應變才能的人。<sup>92</sup>

如今看來，這段見聞凸顯的恐怕不是蔣中正的應變才能，而是以近乎黑色幽默的形式，暴露了國民黨小組會議的脫離實際。似乎自始至終，蔣中重的重點，

<sup>91</sup> 唐秉玄，《唐秉玄台幹班日記（1944-1945）》（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0），1944年2月16日，頁21。

<sup>92</sup> 陳克文，《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1939年12月27日，頁526。

就在將小組會議的性質，從維持政權機體運行的細胞，轉化為在政治以外端正幹部生活作風的勸善活動。是什麼原因，使蔣中正雖然留心青年問題、苦心鑽研《黨的建設》與小組會議，卻得出與中共實踐南轅北轍的結論？

## 五、青年敘事的制約

從〈小組訓練綱領〉的規定來看，國民黨的小組會議未能如願，主要不是由執行失誤所造成，而是制度設計的結果：

小組為訓練黨員之單位，與區分部為黨的基本組織者不同，基本組織為黨的基層權力機關，小組乃訓練單位，故小組會議所討論之範圍，只限於黨義研究等項、其他事項應於區分部黨員大會中議決之。<sup>93</sup>

這就使小組會議成了單純研究理論的讀書會，換句話說，國民黨小組會議雖然嘗試引入以談話為主的中共政治技術，卻不願讓小組會議融入整個政治運作過程中。這也就使國民黨小組會議從來不具有政治核心的功能。甚至可以說，它只是一個模擬政治活動的角色扮演遊戲。這種設計表面上的假設是，透過同志之間熱切的研究討論，可以凝聚政治共識，自然會體現到實際權力運作之中。〈小組訓練綱領〉要求小組會議在區分部黨員大會前一週舉行，也有這樣的用心。<sup>94</sup>也就是說，國民黨雖然沒有以小組會議發揮黨團作用的明確意圖，但其領導人似乎相信，只要實現黨員之間的充分討論，則即使沒有布置細緻的政治工作，也自然會達成事先協調的效果。實踐證明，這樣的假設顯然高估了黨員的政治積極性，也低估了權力運作的複雜程度。

然而，從 1939 年七月上旬日記中的「辦黨方法要帶神祕性」、「黨員辦黨應有神祕技能」等字句來看，<sup>95</sup>蔣中正對小組會議所含的黨團屬性，似乎還沒有完全參透，所以只能以「神祕」二字概括自己隱約察覺的奧祕之處。即使

<sup>93</sup> 編者不詳，《黨務活動手冊》，頁 31。

<sup>94</sup> 編者不詳，《黨務活動手冊》，頁 32。

<sup>95</sup>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7 月 1 日（「本月大事預定表」）、7 月 6 日。

如此，也可以看出，以蔣中政的政治閱歷，不太可能對小組會議涉及的秘密工作技術細節一無所知，更不至於完全忽略政治運作。而國民黨內，也不是沒有夏征農這樣嫻熟領導技巧的政治人才。如以下這位從事黨務的非實名作者，清楚點出小組討論必須建立在討論前、中、後細膩隱蔽的政治工作之上：

討論題綱必須把握主題的要旨，而作簡單的暗示或發問的性質。這裡所謂提綱，就是把小組討論的題目分析成若干主要的討論大綱，使組員均能把握題目的要旨而發言，以免言出題外。主要大綱之下原又可分成若干子目，但子目也不能一律於事先提出。大約教育程度低者，子目自可提示其討論的方向。如果教育程度高者，子目反而束縛了他們討論時的自由發揮，陷入狹小的範圍。<sup>96</sup>

這名黨務人員不僅指出，各組組長與指導員必須在小組會議前協調討論題綱與大致結論，更注意到小組會議的自由討論，其實與隱蔽的引導密不可分。不需要將提綱全盤托出，可以視情況隨時改變方向。他清楚指出，小組會議的自由討論「不應像純粹學術研究那樣的漫無目的，更不能像一般死硬的學究或書生的食古不化」，其目的在以看似客觀的分析，形塑成員認知時局與世界的框架，最終達成政治立場的鞏固。但正因此種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質，必須引導學員自行論證：

例如敵寇退出南寧，乃係受我軍重重壓迫，能攻不能守，我們就不妨以此編成討論題材，加強組員對於我「持久抗戰」與「我越戰越強，敵越戰越弱」的正確認識。但這些實際的題材，應帶有問題的性質，少用說明式，否則只是理論式的說教，很難引起組員的興趣。<sup>97</sup>

其思路與夏征農可說已相當接近，都考慮到利用青年喜好思辨的特性來推進政治工作。

再者，考慮到國民黨只是一個各種利益的鬆散聯盟，缺乏自上而下貫徹黨中央意志的意識形態權威與紀律，加上內部分子複雜，各有盤算，確實不宜貿

<sup>96</sup> 區一執，〈小組會議討論題材〉，《勝利》，新 2 號（1943 年 10 月），頁 12。

<sup>97</sup> 區一執，〈小組會議討論題材〉，《勝利》，新 2 號，頁 12。

然讓基層小組會議參與權力運作。至少在國民黨幹部掌握有效政治甄別與工作技術前，不能指望陳克文這樣的書生能夠以精細編組與談話滲透、分化對象人群團體，以至以少馭多，以弱制強。因此，先讓國民黨人在模擬情境中熟悉民主領導、自由討論等方法，也不失為穩健的辦法。

證諸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期課程，可見其一再強調「應注意技術」。而所謂黨務技術，就是「特別提倡小組會議，自我批評，各教官必須親自指導監督，並作正確之結論」。<sup>98</sup>再從中央訓練團調查演習中關於黨員調查網的討論，我們更可以肯定，蔣中正確實在為小組會議的真正實施，也就是擔負政治運作核心的任務，累積經驗與創造條件：

有一個重要的題目必須討論……就是有關「黨員調查網」的題目……組織調查網來擔負情報責任，也是很需要的……黨員調查網的重要性……臨全大會組織「黨員監察網」的決定……此種反動漢奸等分子的清除，急切需要本黨同志組織調查網來負責做去。<sup>99</sup>

以上是徐恩曾的講評內容。事實上黨政訓練班各期的調查演習，都由這位中統領導人親自講評。他在提示調查工作要點時又指出：

比如作黨務調查……中心要看其黨員訓練工作做得如何？如果訓練很好，便可以發動每一個黨員為黨工作，領導青年，取得民眾信仰。<sup>100</sup>

在評述各小組討論結果時又指出：

各學員之意見，對於黨員調查網之建立方法，陳述頗詳，均中肯要，惟尚有最關重要之兩點未曾提及：

- 一、選擇優秀分子之具體方法。
- 二、優秀分子選定後，進行建立之具體步驟。<sup>101</sup>

<sup>98</sup> 〈中央訓練團訓練與人事〉，國史館藏，《國民政府》，典藏號 001-014400-00003-003，「中央訓練委員會各級幹部訓練實施方案草案」。

<sup>99</sup> 中央訓練團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六期調查演習書面講評（附分組研討總結論）》（重慶：中央訓練團，1940），頁 56-58。

<sup>100</sup> 中央訓練團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六期調查演習書面講評（附分組研討總結論）》，頁 59。

<sup>101</sup> 中央訓練團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六期調查演習書面講評（附分組研討總結論）》，頁 70。

此中優秀分子其實就是積極分子，選擇優秀分子即在進行政治甄別，也就是：「對於學生團員，應於每分隊中，祕密指定忠於團之訓育人員，或學生中之領袖一二人，使調查團員之活動情形」，「就青年聚集處所——如學校，各種青年組織，及各種訓練機關（如鄉鎮長訓練班，小學教員講習會，民訓員訓練班等）——著手調查，並特別注意其最積極活動之分子，或於群眾中奮鬥出來之分子。」<sup>102</sup>這些事實解釋了為何蔣中正日記中小組會議一詞屢屢伴隨監察、考核等概念出現，顯然監察、考核的目標，不僅是公務員的私生活，更重要的還在透過小組會議建立政治甄別的調查情報網，確保後續大規模推廣小組會議所需要的安全政治環境。總之，可以合理推測，1939 年小組會議的制度設計與狀態，只是從模擬訓練到政治實務的過渡。從 1954 年印行的幹部教育叢書的文字來看，歷經十數年教訓後，國民黨對小組的重要性與運作原理是有相當認識的：

小組為黨的基本組織〔。〕黨的工作必須由小組執行，黨對同志教育，亦須在小組內實施，健全小組，為健全整個組織之基礎工作。<sup>103</sup>

又說：

小組會議，是小組一切工作的動力，也是組織力量的泉源，就整個小組說，小組會議的強度有多大，就是組織力量的強度有多大，領導組織者，應以大部分力量，領導加強小組會議。<sup>104</sup>

就此而言，至少幹部教材的作者還是能理解小組會議是一個需要領導實踐的動態政治方法，而並非在一個固定編制中的會商形式。這一基本認識也為蔣中正所強調：

<sup>102</sup> 中央訓練團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六期調查演習書面講評（附分組研討總結論）》，頁 108。

<sup>103</sup> 韋德懋，《幹部工作修養與工作方法》（臺北：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印，1954），頁 49。

<sup>104</sup> 韋德懋，《幹部工作修養與工作方法》，頁 50。

〔小組會議〕不僅是黨員集會的所在……黨員回到小組裡來，只是工作實踐和工作再分配的會報，離開小組出去，才是真正的工作，真正的戰鬥。<sup>105</sup>

這段話有兩層意思：首先，小組會議的重點並不是那場會議本身，真正重要的是發生在小組會議空間與時間以外的準備與執行工作。這就引出第二重意思，小組會議主要是對外工作的一種技術。此處所謂外，就是工作的對象，因為需要執行的具體政治目的不同，可以指組長與核心成員之外的其他黨內同志，也可以指黨外人士。無論何者，小組會議都是一整套政治說服動員技術體系的總稱，而不必是會議本身。

總之，國民黨對小組會議作為政治核心這一關鍵是有一定認識的。隨著時間推移，這種認識也逐漸加深。連帶地，國民黨也嘗試引入相關的政治談話與祕密工作技術，例如提醒幹部：小組在群眾中的組織和活動皆須採取祕密方式；<sup>106</sup>也提倡以平易近人的談話掌握幹部政治態度與能力。<sup>107</sup>

為了讓談話與討論能夠順利進行，國民黨人對青年的整體認識也有所提升。他們開始意識到會議與談話方式必須適應青年習氣，因此對以下這類黨內頗為普遍的情形提出批評：

提起修養，一般人往往會誤會成所謂「修養」也者，不過是對熱情澎湃的青年加以束縛，加以限制，使有所畏忌而不敢放手做事，不敢痛痛快快的去展其抱負；而所謂「有修養」也者，只是些四平八穩的好好先生，或者是摸〔模〕稜兩可的「鄉愿」「官僚」。<sup>108</sup>

除了批判官僚作風，更不斷要求在小組會議中開展以辯論為主要方式的民主討論：

<sup>105</sup> 編者不詳，《總裁關於小組之訓示輯要》（臺北：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印，1954），頁1。

<sup>106</sup> 歐陽旭，《民眾運動的理論與技術》（臺北：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印，1954），頁39。

<sup>107</sup> 馬國琳，《幹部訓練的理論與技術》（臺北：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印，1954），頁59-61。

<sup>108</sup> 韋德懋，《幹部工作修養與工作方法》，頁1。

辯論時各依理則，辯論問題，探討真理，以求獲得最後之結論，此種方式對於辯理析疑，鍛鍊機智，培養風度，論壇鬥爭，都有助益。<sup>109</sup>從這段文字來看，國民黨人顯然也想迎合青年喜好思辨的特質。

然而，這些來臺灣後的教材最多只能證明：國民黨人對小組會議的認識，隨著時間有所加深，特別在被中共擊敗以後，他們對青年與中共政治技術的特點有了較為痛切的理解。但不容否認的是，在 1939 年後的很長時間，似乎並無證據表明小組會議有何進步。陳克文所經歷的那種全無政治目標的談話會，依然是制度與實際上多數國民黨小組會議的寫照。到底是什麼因素，限制了國民黨小組會議成為政治運作的有效環節？

造成國民黨小組會議成果不盡理想的因素很多，但若從國共比較的角度來看，許多因素固然重要，如戰爭動員限制了改革，缺乏足夠有政治素養的基層幹部，都是國共兩黨共有的難題，卻沒有妨礙中共小組會議的功能。基於以上理由，本文僅從國民黨理解青年的侷限解釋問題，因為恰恰在這一點上，國民黨與中共存在顯著的差異。

前文已經說明，蔣中正極有可能出於對青年問題的重新體會而重視小組會議。我們也已經看到，小組會議涉及對青年政治習氣的利用與克服，蔣中正似乎也或多或少意識到這一點。不過，無論對青年習氣，還是對中共的政治技術，蔣中正的接受都有其限度，或者應該說底線。就以 1938 年 11 月 8 日所抄青年如鷹隼之嘆為例，蔣中正雖然對青年反叛家庭，追求獨立自由的青年進步論述有一定同情，但最後還是以「但亦勿可姑息，終期諄諄善誘而已」結尾，可見蔣中正對青年敘事的核心內容，也就是青年先天的進步性，並不認同。上引 11 月 18 日日記關於《黨的建設》及其政治技術的關鍵文字，又是以一段《信仰的意義》中類似自我勉勵的箴言開頭。由於以說教形式表現，看似與時局無關，但其中卻蘊涵了理解蔣中正思路的重要線索：

---

<sup>109</sup> 馬國琳，《幹部訓練的理論與技術》，頁 57。

吾人要在道德範圍中發現真理，惟有在信仰上增加力量，再由信仰上加上希望，使之熱度加高，最後信仰變成實驗，實驗變成經驗，經驗變成智識，如此信仰即成事實。

前已述及，蔣認為中共的教育與經驗「是由其國際百年來祕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訓而成」，「因之其手段亦最毒，情義與道德掃地無餘」。結合此項評價來看，不能說蔣中正摘錄「吾人要在道德範圍中發現真理」時，其中全然沒有針對中共號稱超越道德的科學社會主義真理的意思。蔣顯然認同真理須受道德規範，故他對中共青年真理觀所激發的強大實踐力量雖然嘆服，但主要仍出於技術性的認識，在規範性的「大節」問題上，蔣中正依舊是一名高度自覺自信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也因此斷然拒絕了以科學真理凌駕倫理的青年現代價值觀。這一點與他對青年進步性的拒絕一致。

又如陳誠對小組會議的肯定，同樣也有限度。其 1939 年 3 月 3 日的日記中，還有一段話值得玩味：

趁此機會，使諸同學得相互認識，俾便他日工作，取得聯繫，為此次訓練之主要意義。凡我本黨同志，更須具備「視惡如仇」與「愛人如己」之精神，二者缺一，不流於共黨之刻薄，即近乎官僚之腐化矣。<sup>110</sup> 陳誠不但強調了中央訓練團的聯誼性質，還在小組會議這個政治技術之前，加上了一個「視惡如仇」與「愛人如己」的道德前提。這當然不是說中共的小組會議只是純粹的、冰冷的操控手段，完全不需要道德修養的支援。眾所周知，中共也大力提倡「共產黨員的修養」，以克服青年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習氣。然而小組會議要能運作，卻也離不開青年追求「真理」的「熱度」。而這樣的熱度經常是不顧人情世故等「道德範圍」的。或者說，蔣中正、陳誠等國民黨人所盼望的小組會議是以「視惡如仇」的態度自我批評，以「愛人如己」的厚道相互批評，這種著重「講信修睦」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或許確實能避免流於他們所謂「共黨之刻薄」，但也很難不「近乎官僚之腐化」。因為只要還在日

<sup>110</sup> 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一）》，1939年3月3日，頁201。

常人倫的框框套套內，就有上下倫序，自我批評與互相批評就不可能完全服從組織與上級的政治理性。

故對中共的小組會議而言，青年追求「真理」的「熱度」是其政治機器沛然莫之能禦的主動力，道德修養只是剎車減速的輔助部件或潤滑油。但對國民黨而言，政治動力來源是不溫不火的人際倫理，本來難以指望其推動整個黨國體制高速運轉。在此情形下，小組會議及其政治技術，就是煽風點火。煽得太過猛烈，爐火不僅不可能爆發巨大熱能，說不定還熄滅了。蕭贊育的敘述鮮明地反映了這種倫理的束縛力量：

民國二十七年，我們由漢口到了四川，委員長認為侍從室應有黨的組織，並應重視檢討批評，我們侍從室第二處，便成立兩個小組，由我和周佛海分任小組長，小組會議規定最後一項為檢討與批評。布雷先生怕批評有傷同仁間的和氣，主張暫緩實施，但亦未報告委員長。後來第三處成立，亦復如此。所以有人說，總裁命令，不行於侍從室。實則此項有意義的檢討批評制度，在其它政府機關，亦只是徒有形式，未曾切實推行。這對於我中央以至地方的革新進步，利弊得失究竟如何，實是一個值得檢討研究的問題。<sup>111</sup>

陳布雷也曾看過中共《黨的建設》，時間還早於蔣中正數月。<sup>112</sup>如果連在蔣中正眼皮子底下的侍從室，尚且因為陳布雷在倫理上的顧慮而不能貫徹總裁的命令，想要在全國推行又談何容易？畢竟到處都有像陳布雷這樣有所不為的「狷者」。誠然國民黨中也存在少數通曉青年敘事之人，如中統內部就有一些被國民黨「轉變」的青年。這些前中共成員曾經浸淫於「進步思潮」中，對揭人隱私與自我批評的小組生活習以為常。然而這批人終究與深受「戴季陶主義」儒家倫理影響的國民黨文化格格不入，以致於發揮不了多少作用。<sup>113</sup>於是，大多

<sup>111</sup> 蔣京訪問紀錄，《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 115。

<sup>112</sup> 《陳布雷從政日記（1938）》，8月9日，頁 116。

<sup>113</sup>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頁 206。馮啓宏，《從講習所到研究院：國民黨的幹部訓練（1923-1952）》（臺北：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13），頁 362。

數國民黨人既不可能置人際倫理於不顧，其政治甄別也必然如下引〈黨政訓練班第二期優秀學員報告表〉的狀況，以諸如「較成熟者」、「可堪造就者」、「華僑」這類政治意涵模糊的範疇，迴避對所有幹部政治品質的切實識別：

蔣經國

考察所得：曾在國外當過苦工苦農，苦其心志，餓其體膚，然其天真性格，猶溢於言表，而益增強其前進有為之銳氣。

楊興榮

考察所得：矢忠三民主義，有血性，不失為一純潔有為青年。<sup>114</sup>

雖然明眼人能從副教育長王東原「頗有分寸」的評語中體會蔣經國的政治分量，也能察覺楊興榮不特別優秀，但卻很難由此判斷兩人在政治運作中的實際面目與能力。我們也可以看到，王東原的評價雖然依循人際倫理的邏輯，但用詞遣字卻吻合青年敘事。無論是「然其天真性格，猶溢於言表，而益增強其前進有為之銳氣」，還是「有血性，不失為一純潔有為青年」，皆為典型的青年敘事政治話語，也就是以天真、純潔、朝氣、血氣等政治外（extrapolitical）青年質素，來修飾甚至淡化政治的（political）因素，實際上承認了政治正當性來自青年進步性的預設。這反映國民黨政治實踐在青年敘事陰影下的窘境：亦即其政治敘事與實踐脫節。在此窘境中，國民黨不可能真正放開政治討論，更談不上實現：

只要有正確的意見，就能以最低的地位，表現最高的權力，本黨為執政黨，能圓滿做到這一點，黨員對小組會議，自然會產生興趣，不然小組會議，徒具形式，就令討論有關具體政治問題，亦是討論自討論，施政自施政。<sup>115</sup>

這種「真理越辯越明」的想像，不僅在國民黨的政治現實與文化中根本無法實現，也從不是中共小組會議的樣態。如前所述，中共小組會議始終是貫徹上級

<sup>114</sup> 〈特交檔案（黨務）—中央訓練團（第0三八卷）〉，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300-00044-013，「王東原呈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三期優秀學員報告表」。

<sup>115</sup> 韋德懋，《幹部工作修養與工作方法》，頁 51。

黨政治意志的技術體系，其內部看來自由的討論，是領導借助群眾力量以統一意見行動的結果。如果領導工作到位，小組成員完全可能在自以為非常自由的情形下得出上級預設的結論，但這並不能改變這樣的事實：若無規畫安排，小組內的辯論即使熱烈非常，都不會有任何政治意義。就此而言，中共的成功，與其說是順應青年民主討論敘事，不如說是對其最認真的控制與運用。<sup>116</sup>

換個角度講，假使小組會議真如國民黨人所以為，能讓持正確意見的最低地位者享有最高的權力，整個黨政組織運作必將陷入癱瘓。蓋嚴肅的政治問題，很少有簡單的正確答案，即使經過充分討論也未必有共識，往往必須由領導做最後決定。而這樣的決定經常是各種衝突因素妥協的結果，而不一定符合推論上的正確。更何況政治上正確的意見未必是眾人所願意接受，為眾人接受的也可能是錯誤的。把權力交給論辯中一時受到眾人認可的人，並不能保證正確意見的出現，徒然導致辯論失控，小組會議容易成為不顧實際、徒逞口舌的修羅場。

最能反映國民黨對青年民主討論迷思之處，或許便是其小組的編組方式。如前所述，共產黨自始就強調編組內的高低搭配，以確保政治、文化素養高的積極分子對落後分子的影響力，這也是中共能夠以少馭多的訣竅。反觀國民黨，由於輕信民主討論能自發產生，於是為了使討論熱烈，總是主張將文化程度相當、乃至興趣相近的人編組在一起。陳布雷的侄兒陳孟扶就是一例。這位做過縣長與督察專員的國民黨中堅幹部，為了使討論熱絡，索性將小組拆分為檢討工作、共同興趣、教育補習三種彼此無關的類型。<sup>117</sup>可以想見，這樣的小組會議或許談話投機，但如何能在「朋友圈」以外發揮政治核心的作用？

<sup>116</sup> 黃道炫關於整風心靈史的研究，對此有相當深入細緻的探討，見黃道炫，〈整風運動的心靈史〉，《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頁4-26。

<sup>117</sup> 孟扶，〈「小組會議」怎樣編組才稱完善？〉，《勝利》，新1號（1943年6月），頁14-15。中央訓練團的編組方法亦復如此，無論「混合分組」、「地區分組」、「專業分組」皆無配置積極分子的功能。〈特交檔案（黨務）—中央訓練團（第0三八卷）〉，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300-00044-006，「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期訓練實施計劃」。

國民黨由於從未充分掌握具體技術，也就難以使小組會議真正發揮黨團或細胞的功效。因此國民黨雖然時時倡言發揮黨團作用，打入各種社會組織領導民眾，卻缺乏以小組集體作戰的實際能力，依然只能教導幹部「運用個人的社會關係或黨員自己在社會的地位，與反動勢力相鬥爭」。<sup>118</sup>

在沒有替代青年敘事與政治技術的情形下，國民黨即使規定：「舉行小組會議時，要極力避免板重的形式，無論在操場在野外，或辦公廳內，都可因時因地來舉行」，<sup>119</sup>「小組會議於每四次中得有一次不拘形式舉行，如座談、茶會、聚餐、或野餐等」，<sup>120</sup>擺出貼近青年風格的姿態。但這種規定出來的不拘形式根本無濟於事，得不到青年的有效配合，於是國民黨只能繼續以調查演習，其實也就是以特務諜報的低效方式，艱難進行政治甄別與發現積極分子的工作。

對青年敘事民主討論神話的迷信，不僅妨礙踏實思想領導的推動，又進一步促進了政治工作的特務化路徑。過於看重以論辯形塑共識的結果，就是高估了以話語直接操控群眾的能力，也低估了長期耕耘的必要與難度，國民黨人乃妄圖以「選技〔擇〕優秀幹部並予以精神上之控制」，<sup>121</sup>或指望能言善道的特工人員打入群眾，然後憑一時的鼓動一舉達成政治意圖，而有以下的論斷：

軍隊作戰是著重在怎樣爭持到最後五分鐘以獲得勝利，而民眾運動則須爭取最初五分鐘，把握群眾的亢奮情緒。<sup>122</sup>

其邏輯是只要在五分鐘內使提議得到民主程序的通過，一切就大功告成。殊不知這種標準的「機會主義」、「冒險主義」策略，也可以隨時被敵手輕易顛覆。

國民黨重視倫序的文化以及與派系妥協的權力架構，使其對青年敘事反建制的本質理解程度受限，低估了青年顛覆一切的政治想像。國民黨不知道的是，僅僅改變某些活動的型態，遠不足以消解青年對現有權威與官僚組織發自

<sup>118</sup>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校，《中國國民黨黨員須知》，頁 40、127。

<sup>119</sup> 鍾武，〈推行小組會議的絆腳石〉，《黨魂》，期 6，頁 78。

<sup>120</sup> 編者不詳，《黨務活動手冊》，頁 36。

<sup>121</sup> 社會部編印，《人民團體幹部訓練業務課程講授大綱》（重慶：社會部，1945），頁 29。

<sup>122</sup> 歐陽旭，《民眾運動的理論與技術》，頁 45。

內心的反感。若要滿足青年依據所謂「真理」否棄一切成規與利益衝突的政治想像，除非是從根本上否定國民黨自身維護既有政治秩序的論述與努力，不那就必須徹底改變青年那套從自我出發，對現實去歷史化、去政治化的理解模式。國民黨小組會議雖然借鑑了若干中共的政治技術，嘗試以青年喜聞樂見的方式推動政治工作，但忽略了在迎合青年之外，中共規訓克服青年習氣及其政治想像的手段，以致只知在會議形式上迎合青年，卻始終不能產生適合政治實際的權力運作機制。結果，虛擬的角色扮演終究無法激發青年參與的熱度，自也無法在言論思辨中發揮民主的集中作用，更談不上政治甄別與建立核心。國民黨的小組會議，不得不長期停留在生活檢討與漫談的初級階段，如蔣中正在 1954 年所承認：

我認為現在黨只是把小組變成了一種形式的集會，而不是革命的結合，沒有革命的氣氛，對組員更沒有合理的工作分配……成了一個民權初步訓練的班次，始終還沒有能夠形成為黨的戰鬥單位！<sup>123</sup>

## 結 論

青年敘事固然在政治上發揮了深刻的作用，但它卻不是國民黨推動小組會議的直接原因。許多國民黨人很可能只是覺得需要模仿中共的組織型態，並未真正意識受到青年敘事的影響。另一方面，影響小組會議成效的因素非僅一端。倘若國民黨能夠充分利用與節制青年敘事的內在邏輯，或許小組會議的功能可以發揮得比較好，但也很可能因為其他結構性問題，如地方派系陽奉陰違、黨員幹部脫離群眾等等，導致結果不如理想。青年與小組會議既不是國民黨一切積弊的解方，也不是中共成功的唯一殺著。既然兩黨都是成因極為複雜的歷史現象，試圖一言以蔽之的概括之論，只能是以偏概全。本文藉由若干案例，指出青年敘事與小組會議之間因為類似的歷史邏輯而存在的可能相關性，

---

<sup>123</sup> 編者不詳，《總裁關於小組之訓示輯要》，頁 32。

進而探討兩黨行為背後共同的現代性限制，觀察中國現代政治發展的性質，並嘗試提出淺見，希望能引出更有價值的討論。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國民黨實施小組會議的歷史經驗，可視為中華文化基於長期實踐的政治智慧，對西方抽象思維及其青年敘事本能牴觸的結果。青年及其敘事此一現代產物，將幾代中國年輕人的蓬勃朝氣，史無前例地轉換為政治上不可遏抑的偉大變革力量，從而使中國得以突破內外困境，最終完成整個文明國家的重生。此一歷史功績不容抹滅。同時難以忽略的是，由於其外來性，青年敘事所要求的政治秩序，必須經過與傳統長期艱難的磨合，才能去蕪存菁，實現其福國利民的使命。曾經是左翼青年的歷史學家胡秋原（1910-2004），對此磨合期的困難本質，有一段令人深省的議論。他指出「新生」，也就是習染現代性的青年，其實是這樣一個歷史的產物：

他們成為「意識形態人」，……人雖是中國人，但產生他們的，是歐美日本近代國家的歷史。……因社會在解體中，使他們日益喪失自己的社會地盤與紐帶，日益與社會脫節，加上學力之不足，經驗之不足，更造成本身之弱。其親外人而不親中國固然是弱的表現；即不滿現狀，趨於衝動，趨於極端，亦是弱的表現；這也成為整個國家之衰弱。<sup>124</sup>

出於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胡秋原的說法或許失之片面。青年雖有其現代性根源，但也不全然是外國歷史的產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廣義西方文化霸權的籠罩下，青年的進步性所以顯得如此強勢與銳不可當，與其說因其正確，不如說反襯出本國文化與自身智識的弱勢地位，以致所謂進步往往即指脫離中國現實。在此情形下，國共兩黨的發展，遠不是一往無前發動青年追求進步那樣簡單。真要建立穩固的新秩序，必須為彌合青年進步性與鄉土中國間的斷裂而付出巨大努力。就此而言，中共採取的積極引導與超越，大致要比國民黨的有限配合與迴避，更能成功處理青年及其敘事帶來的問題。蔣中正能夠感知青年敘事與小組會議技術的內在聯繫，雖有限度，已屬不易。但由於僅僅出於文化本

<sup>124</sup>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臺北：學術出版社，1980），頁 36-37。

能，未能真正自覺地應對現代性霸權的挑戰，僅憑一、二人之才智，終究難與社會主義百年來超克現代性的實踐經驗匹敵。國民黨人試圖將進步性納入傳統倫理中，使之從一種顛覆性的衝動，轉化為建設性的力量。這條思路其實不錯，卻忽略了傳統中部分價值規範已然式微或者僵化，無法獨力維繫現代政治的運作，也高估了現代文化包容他者的能力。於是，不明就裡的國民黨人，如同在國產作業系統中不斷試圖執行外來作業系統下的程式，造成當機甚至硬體損壞的結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

- 〈中央訓練團訓練與人事〉，國史館藏，《國民政府》，典藏號 001-014400-00003-003，「中央訓練委員會各級幹部訓練實施方案草案」。
- 〈特交檔案（黨務）—中央訓練團（第 0 三八卷）〉，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300-00044-006，「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期訓練實施計劃」。
- 〈特交檔案（黨務）—中央訓練團（第 0 三八卷）〉，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300-00044-013，「王東原呈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三期優秀學員報告表」。
- 〈領袖指示補編（十四）〉，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106-00014-004，「蔣中正電陳果夫對黨員應著重組織間領導與幹部政治並編入黨的建設及說明中國適合三民主義不適合馬克斯主義與共黨生存」。
- 中央訓練團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六期調查演習書面講評（附分組研討總結論）》，重慶：中央訓練團，1940。
- 中央執行委員會編印，福建省秘書處翻印，《黨員須知草案（再版）》，1940。
-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校，《中國國民黨黨員須知》，重慶：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1941。
- 中華青年救國團體聯合辦事處、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為紀念中國青年節聯合宣言〉，《中國青年》，卷 1 期 2，1939 年 4 月，收入《紅色檔案》編委會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冊 58，《中國青年》，卷 1，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頁 42。
- 甘乃光，《小組的運用》，廣州：中山大學，1927。
- 甘乃光，《以黨建國》，廣州：廣州國民新聞報社，1926。
- 列寧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 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收入朱光潛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朱光潛全集》，卷 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 艾思奇，《大眾哲學》，收入艾思奇，《艾思奇文集》，卷 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余伯由，〈蘇公倡議召開的兩次蘇中青年會議〉，收入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蘇中公學校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頁 40-42。
- 李培南，〈分局黨校討論反省自傳的介紹〉，收入毛澤東等著，《思想指南》，出版地不詳：北方出版社，1949，頁 114-120。
- 孟扶，〈「小組會議」怎樣編組才稱完善？〉，《勝利》，新 1 號，1943 年 6 月，頁 14-15。

- 武慶元，〈政治課與思想領導配合起來〉，《生活（蘇中）》，新期 3，1946 年 3 月 8 日，頁 72-73。
- 社會部編印，《人民團體幹部訓練業務課程講授大綱》，重慶：社會部，1945。
- 韋德懋，《幹部工作修養與工作方法》，臺北：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印，1954。
- 夏征農，〈蘇中青年代表座談會特輯：做好兩件事迎接蘇中青年代表大會：蘇中青年代表座談會總結〉，《生活（蘇中）》，期 4，1945 年 6 月 10 日，頁 1-7。
- 夏征農，《思想教育舉例》，吉林：新中國書局，1949。
- 徐敬哉，〈小組會議之理論與實踐〉，《政治前線》，卷 4 期 6，1941，頁 15-22。
- 馬國琳，《幹部訓練的理論與技術》，臺北：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印，1954。
- 高宗龍，〈如何改進縣政工隊？〉，《勝利》，號 29，1939 年 5 月，頁 9-10。
- 區一執，〈小組會議討論題材〉，《勝利》，新 2 號，1943 年 10 月，頁 12-13。
-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第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政治部編，《黨的建設》，出版地不詳：出版者同編者，1939。
- 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領導作風》，大連：大眾書店，1947。
- 陳秋濤，〈內心的話〉，《越王魂》，期 5，1939 年 2 月，頁 16。
- 馮啓宏，《從講習所到研究院：國民黨的幹部訓練（1923-1952）》，臺北：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13。
- 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歐陽旭，《民眾運動的理論與技術》，臺北：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印，1954。
- 編者不詳（晉西黨？），《黨的建設》（1941），收入重慶圖書館編，《重慶圖書館藏民國時期未刊書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16，冊 6，頁 3-234。
- 編者不詳，《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三期訓練實施計畫》，重慶：中央訓練團，1939。
- 編者不詳，《總裁關於小組之訓示輯要》，臺北：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印，1954。
- 編者不詳，《黨的建設》，列入「敵情研究參考資料」系列，臺北：陽明山莊，1951。
- 編者不詳，《黨務活動手冊》，重慶：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1944。
- 編者不詳，萬大鈺（萬亞剛）校訂，《黨的建設》（1938），收入《調查專報》第 4 號，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38。
- 蔣中正，《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6、19，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
- 鍾武，〈推行小組會議的絆腳石〉，《黨魂月刊》，卷 2 期 2，1940 年 12 月，頁 76-78。
- 饒漱石，〈反省階段中的工作中心及如何進行反省〉，收入：編者不詳，《整風運動參考材料十集》，寶應：江潮社，1944，頁 3-7。
- Wilde, Oscar.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London; New York: Penguin, 2000.

## 二、日記、回憶錄、訪問紀錄

- 〈熊式輝日記〉，1938，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Butler Library）藏。
- 〈蔣中正日記〉，1938-1939，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統內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 王公瓊，《畸園殘稿》，臺北：王公瓊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會籌備委員會，1984。
- 王貽蓀，《王貽蓀戰時日記（1941）》，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
- 牟宗三，《五十自述》，收入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冊 3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 吳雲，《無悔的奮鬥——吳雲回憶錄》，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
- 武衡，《無悔——武衡回憶錄》，北京：專利文獻出版社，1997。
- 唐秉玄，《唐秉玄台幹班日記（1944-1945）》，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0。
- 陳布雷，《陳布雷從政日記（1935）》，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
- 陳布雷，《陳布雷從政日記（1936）》，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
- 陳布雷，《陳布雷從政日記（1938）》，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
-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一）》，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 楊力航，李孝賢，〈蘇公生活片斷〉，收入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蘇中公學校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頁 137-143。
-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臺北：李敖出版社，1990。
-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 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
- 趙帝江、姚錫佩編，《柔石日記》，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 蔣京訪問紀錄，《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

### 三、專著

-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 汪堂家，《現象學的展開：《自我的覺悟》及其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
- 沃倫·布雷克曼（Warren Breckman）著，李佃來譯，《廢黜自我：馬克思、青年黑格爾派及激進社會理論的起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臺北：學術出版社，1980。
- 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著，尹垠、蔣開君譯，《實踐現象學：現象學研究與寫作中意義給予的方法》，北京：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8。
- 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撰，胡貽穀譯，《信仰的意義》，上海：青年協會書報部，1929。
- 程巍，《中產階級的孩子們：60 年代與文化領導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臺北：國史館，2011。
- Wyn, Johanna, and Rob White. *Rethinking You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 四、論文及專文

- 吳端，〈對日本青年研究之理論的探討與借鑒——一個歷史與思想文化的視角〉，《當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4期，頁7-16。
- 李志毓，〈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左派青年的困頓與探求（1927-1932）〉，《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頁60-69。
- 唐小兵，〈民國時期中小知識青年的聚集與左翼化——以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為中心〉，《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11期，頁64-80。
- 馬思宇，〈無形與有形——中共早期「黨團」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2期，頁32-47。
- 黃道炫，〈整風運動的心靈史〉，《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頁4-26。
- 趙諾，〈中共晉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評會〉，《抗日戰爭研究》，2020年第3期，頁4-21。
- 劉東慶，〈流亡青年與軍隊政工：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的曲折歷程（1938—1941）〉，《民國檔案》，2019年第3期，頁126-135。
- Dubet, François. "Youth." In Sarvepalli Gopal and Sergei L. Tikhvinsky, eds. *History of Humanity Vol. V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98-101.
- Roucek, Joseph S. "The Role of Youth in Modern Politics." *Il Politico*, 32:1 (Marzo 1967), pp. 91-107.
- Walker, Barbara. "Kruzhok Culture: The Meaning of Patronage in the Early Soviet Literary World."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1:1 (February 2002), pp. 107-123.

## Youth Narrative in the Nationalist Party's Small Group Meeting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Techniques

Wang Chen-cheng\*

### Abstract

Youth narrative assumes that youth is the force of progress in history. It also requires a kind of modern politics in which the supposedly innate knowledge and progressive worldview of youth are respected as the major source of legitimate power. As a form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practice prevailing in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 small group meetings (*kruzhok*) embodied the tenet of the youth narrative.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from the youth narrative and the CCP, the Nationalist Party adopted small group meetings in late 1938. By emulating CCP's *kruzhok*, Chiang Kai-shek believed that the whole Nationalist regime could be reinvigorated and thereby regain the support of youth. However, youth narrative was never fully accepted by major Nationalist leaders who cherished traditional values rather than the value-free truth. As such, those techniques based on youth narrative could not be properly applied. T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reminds us that youth narrative, like other metanarratives, remains relevant to the practices and understandings of modern politics.

**Keywords:** youth narrative, small group meetings, party construction, cadre education, political techniques

---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